

流離與回返： 民初廣東文人汪兆鏞的遺民風景

余佳韻*

摘 要

辛亥之後，傳統文人除須面對政治體制的變革以外，尚需面對來自於西方的新思潮以及新舊時代轉換所帶來的衝擊。不同於上海遺民與政治間的密切關聯，出身學海堂的這一批廣東遺民的文化屬性更為鮮明。他們在清亡後致力保存傳統文化，通過傳統文獻的校注刊刻、師友生平文獻整理確立個人的文化遺民的姿態，另一方面，他們也為個人的遺民抉擇而辯駁。學界向歷來的研究主要圍繞汪兆鏞的生平與遺民氣節為論，而較少論及往返原鄉與寓居地的這種遷徙型態對汪兆鏞學術事業的影響。本文以「流離與回返」為中心，通過汪兆鏞的個案研究，觀察廣東遺民文人在世變之際避居他所的過程中的自我敘述，反映出當時處於新舊時代交替下的另一種遺民樣態。

關鍵詞：廣東、遺民文人、汪兆鏞、離散、回返

* 香港浸會大學孫少文伉儷人文中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Vagrancy and Return: A Research on the Cantonese Qing Loyalist's Scenery of Wang Zhao-Yong

Yu Jia-Yun

Research Associate, Mr. Siomn Suen and Mrs. Mary Suen
Sino-Humanitas Institute (SHI),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 traditional literati not only need to confront the innovation of political system, but the new trend of thought and cultural shock resulted from the transit from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Different from the loyalists in Shanghai usually have connections with political activities, the Cantonese loyalists are celebrated for their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They devoted themselves to conserving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properties to structure their self-identity through the revision, annotation, edi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In addition, they also defended for their choices of being the Qing loyalists. The earlier researchers mainly focused on the Wang Zhao-Yong's life and integrity; however, they merely mention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lifestyle of migrating back and forth from Guangzhou to Marco and his academic cause.

This paper i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vagrancy and return, trying to observe the Cantonese literati's self-narrative under the unsettled conditions and to reflect another kind of image of these Cantonese literati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via the research of Wang Zhao-Yong.

Keywords: Guangdong, Qing loyalist, Wang Zhao-Yong, Vagrancy, Return

流離與回返： 民初廣東文人汪兆鏞的遺民風景*

余佳韻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陳寅恪

一、前言

明清之際與清末民初的遺民研究為近年學界關注的議題，其間最常探討的不外乎是文人個人自我認同與主體性的建立，夾雜於異代之交的生命抉擇，以及個體與時事間的相互對應等層面。遺民作為一種異代交替之際的時間現象，趙園道出了其宿命的悲哀本質，她說：「『遺民時空』出諸假定，又被作為了遺民賴以存在的條件。時間中的遺民命運，遺民為時間所剝蝕，或許是其作為現象的最悲愴的一面。正是時間，解釋了遺民悲劇之為『宿命』。」¹之所以「遺」，是由於這批文人懷抱舊朝而不事新君的身分就註定了一生將定著於王朝覆滅的前夕，便僅能透過追憶與復述過往填補生命中失落的情感缺口。

辛亥鼎革之後，由於政治體制的陡然轉變，傳統的學術養成方式與倫常規範也遭到前所未有的質疑與挑戰。誠如胡平生所言：「在遜清遺老眼中，辛亥變起，民國

* 本文初稿發表於香港浸會大學孫少文伉儷人文中國研究所舉辦的「轉變、接受與認同－清代文化轉型與士人定位」第一屆青年學者國際學術研討會。特別感謝鍾夢婷女士在會後提供了學者 Elizabeth Sinn 中繼站 (in-between) 的研究觀點與當代離散文化研究的現況。兩位匿名審稿人珍貴的審查意見也讓筆者獲益良多，在此一併致上謝忱。

¹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373。

建立，不單是一項政權上的轉移，更是傳統儒教思想淪亡的象徵。」²新的民國體制之所以不被這群遺民接受，不僅是「帝國」與「民主」的體制變更，而是學術文化的整套置換。原本的社會身分以及依據這個身分所規劃出的人生志業皆因政治的變異而宣告無望；而建構這個身分的儒家經義與學術典式一旦被排除，也等於是揚棄了文人舊來所習受的學術養成方式與遵循的體制規範；既須承受自身所信仰的價值體系的崩毀，同時也失去了原本在舊體制下的話語權。民初社會對儒家傳統的檢討聲浪更助長了文人們邊緣化的焦慮，延伸出「於國於家成棄子」的茫然與自我懷疑。從而，此時的遺民論述通常帶有一種濃厚懷舊與欲回返正軌的傾向，試圖表彰他們所代表的舊傳統在新時代裡的存在價值。

遺民之所以被稱之為遺民，並不僅僅是這群人在時間線段所呈現的停滯與徘徊，彷彿被時代所遺落；而是這群人的文化心理上，始終都有一個「舊朝」的意識存在，驅使著他們往懷舊氛圍靠攏。這種「舊朝」的心理，涵蓋了政治制度與傳統文化兩個層面，前者表現為對舊政權的戀慕與恢復以及對新政權體系的批評反抗，到隱居退守；後者則體現為對典章文物、道德規範以及學術傳統的固守與維護。相較於上海地區的遺老們與舊朝人員密切的政治互動，多數的廣東遺民選擇的是投入廣東地方志與文獻典籍的寫作，呈現了頗為濃厚的文化屬性。³廣東自辛亥以後，動盪的亂象遲遲未能平靖。除 1914-1917 年間桂系軍閥入主廣州以外，又接連發生了 1920 年的粵桂戰爭與 1924 年的廣州商團事變⁴，局勢更形險峻。此時，港、澳與廣東的地緣關係以及殖民地的身分正好提供了當時廣東人民移居的可能。部分的廣東遺民文人遂於此時南遷至港澳殖民地避禍，並開展了一系列的自我表述，汪兆鏞便

² 胡平生：《民國初期的復辟派》（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頁 54。

³ 林志宏即曾指出「清遺民的居處地距離北京愈近者，其涉入政治活動大抵愈深；而離開北京愈遠，則主要以文化活動為主。」並歸納廣東遺民的活動偏向文化性為多。本文即採此說。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清遺民與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的轉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頁 72。又，關於民初時期文化遺民的概念，可參照羅惠縉：《民初「文化遺民」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頁 16。

⁴ 本段歷史可參照：廣州市市政廳編：《廣州市沿革史略》（香港：崇文書店，1972），頁 59-73。又，關於廣州商團事變，尚可參照：John K. Fairbank,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2,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530-531.

是其中的代表之一。⁵

汪兆鏞（1861-1939），字伯序，一字憬吾，自號慵叟。清亡以後，汪兆鏞引宋遺民汪炎〈元日書懷詩〉「年光除日又元日，心事今吾非故吾」句，改號今吾。又號微尚居士、清溪漁隱。⁶廣東番禺人，祖籍浙江山陰（即紹興）。為汪兆銘（1883-1944，即汪精衛）之長兄。早年曾隨父親遊幕廣東，後因科舉三次不第，為家計之故，遂應地方長官之邀於翁源、赤溪、遂溪與順德等地佐幕，奠下了他對廣東地理風土的認識。辛亥（1911）以後，汪兆鏞即以遺民自詡，年譜不再置年號，僅以干支紀年，以表不入民國之志。胡漢民（1879-1936）曾於民國建立後邀請汪兆鏞任鹽政局長，他辭謝不就。壬子（1912）時汪精衛至廣州與兆鏞相見，他亦表明誓不任事。後為避亂事移居澳門，自1911至1939過世前二十多年間往來於廣州、澳門十餘次，斷續居住了十三年。⁷晚年得溥儀賜「福」字，歿後賞「志節不移」匾額。其學術著作大多成於辛亥以後，如《稿本晉會要》、《山陰汪氏譜》、《陳東塾先生遺詩》、《憶江南館詞》暨《集外詞》等等。

⁵ 學界關於廣東遺民群體研究已有初步成果。其中或以政治文化變革的角度解明遺民群體與新的政權之間的矛盾關係。如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清遺民與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的轉變》，從政治變革探討舊文人與新體制間的相互關係，以及遺民文人在辛亥鼎革的新舊體制轉變之間的活動概況，歸納出晚清遺民面臨新的時代抉擇時的共同心理與文化認同的傾向。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即是試圖以社會學觀點切入地域／國家之間的權力與資源分配關係，重新解讀晚清時期的廣東文化——包括當時的歷史語境以及「廣東文化」背後的權力運作。書中第四章「追溯嶺學」，著眼於19世紀的學海堂與當時廣東整體政治、社會的關係，以及日後成為學術中心的始末。兩者皆是以社會學的角度，由政治文化角度勾勒出晚清廣東文化的多樣性與複雜性的同時，也提供了我們理解廣東遺老背景的途徑。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164-212。

⁶ 清·汪兆鏞：《清微尚老人兆鏞自訂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頁3。

⁷ 民初廣東政治紛亂，由於地緣因素，許多文人在此時都選擇避居港澳，其中尤以移居香港者數量為最。汪兆鏞選擇了澳門而沒有到香港，或許與他不欲與政治牽連，而屢次在詩文裡重申的避禍心態有關。汪兆鏞往來於廣州、澳門間的次數頗多，如「1911年11月至澳門寓小三巴寺街。隔年9月返廣州」、「1913年7月，廣州亂，再避地澳門，寓下環街」、「1917年朱慶瀾與陳炳琨不睦，孫中山來粵，亂狀復起。7月12日挈媳孫避至澳門蕉園圍1號」，「1923年陳炯明軍將從增番交界攻入廣州，遂攜兒女赴澳，寓峨嵋街。」如此種種不下十次，廣州當時的局勢之亂，汪兆鏞思鄉之切而安定之日難望的苦痛自不在話下。詳見清·汪兆鏞：《清微尚老人兆鏞自訂年譜》，頁36、37、43。關於汪兆鏞的生平經歷，詳可參見：彭海鈴：《汪兆鏞與近代粵澳文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頁26-42、94-113。

現今學界對汪兆鏞的研究不多，雖然近年已有《汪兆鏞詩詞集》與《汪兆鏞文集》陸續出版，但仍屬於文獻材料的蒐集整理。專著也僅有彭海鈴的《汪兆鏞與近代粵澳文化》。書中詳盡地考察了汪兆鏞的家世源流、生平背景、學承交往，乃至於日後對粵澳文化事業的貢獻，為本文提供了不少基礎背景。惟其中對汪兆鏞的討論方式較為傳統，僅是以個人的生平背景與交遊為基本架構，並未進一步考量到汪兆鏞的遺民身分，數度往返澳門與廣州之間的心態與學術事業間的關聯。

「離散」(diaspora) 作為當代文化研究的重點之一，是指「跨越地理、歷史、語言、文化與國家疆界的流動」⁸，涉及殖民或後殖民主義下的人群遷徙、想像與認同。此一語彙於地理學上的意義，是著眼人處於不同文化脈絡的地理空間下，所衍生的國家、文化認同等問題。學者 Elizabeth Sinn 將離散的研究擴大到了地理上的 in-between (中繼站) 的關係，以香港為中繼點，觀察其在中國與美國之間的貿易與人流來往中扮演的地位。⁹借用此一概念檢視這一批清末民初的廣東遺民文人遷居至港澳殖民地場域的自我表述。港澳殖民地的存在對這一批南來文人而言，也如同中繼站一般，僅為暫居或是轉進的途徑，而非久居之所。這些人雖然去土離鄉，卻始終擁抱著舊日的國家認同與價值典範。避處殖民地一事縱然並未造成遺民文人與新文化語境的隔閡，但政治的變革仍舊讓他們在新舊體制與中西學術間的矛盾與夾縫

⁸ William Safran 曾提出離散的五個特徵，分別是：一、分散到兩個地區以上；二、對故鄉的共同神話；三、疏遠 (alienation) 於故鄉；四、返回故鄉的理想化；五、與故鄉之間的持續性的聯繫。轉引自：斯安竹：《海外藏族的文化變遷與適應——以達蘭薩拉的藏族為例》(臺北：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頁 77。原文見 William Safran,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y: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Diaspora* 1 (1991), pp. 83-84. 由於廣東居處於南方，民初的混亂使得無數文人避居港澳二地。他們將殖民地視作人生的中繼站，抱持著對故鄉的懷想，在殖民地中進行自我書寫。汪兆鏞在亂後重複往返廣州、澳門之間，昔日的故土與現實的家園既似隔離，卻又有聯繫；殖民地雖看似得以久居，但終舊是信美而非吾土。他們懷抱著遺民自我認同，卻由於政治與地理的因素，與故鄉之間存在著既近且遠的聯繫，既具有現實連結，卻又包含了想像成分。然而無論是哪一種，難以自安便是這批遺民文人的寫照。可以說，這一批民初的廣東遺民文人，是時空錯落下的存在。於時間上與舊國和舊鄉隔絕，在空間上又處於「國中之國」的地位，因而產生了一種與離散書寫極為類似，卻又未能完全相合的群體移動狀態。引文見李有成、張錦忠主編：《離散與家國想像：文學與文化研究集稿》(臺北：允晨文化，2010)，頁 27。

⁹ 關於 19 世紀的香港與加州淘金熱、華人貿易的問題，可參照：Elizabeth Sinn, *Pacific Crossing: California gold, Chinese Mig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10.

之間難以自處。遺民文人們除了因政體轉變而成為政治上的「流離」與身不由己而須避居異地的「流離」現實以外；恪守傳統學術的姿態又被評價為與時相忤，不啻也是另一種價值認同的「流離」姿態。處於這種不確定的生命概念中，個人定位與價值的追索便成為文人更急切證明的命題，於是才會衍生出「回返」的想望。澳門作為當時廣東遺民避居的選擇之一，在既近且遠，風物既有相似，也有殊異的殖民地裡，文人展開了一系列的書寫，繼描繪異地風景，亦表現對故鄉的懷想與懸念。從而，所謂「回返」，是與現時為對照，著眼於這一群廣東遺民在新政權建立以後，藉由地域的連結，歷史敘述、典籍搜羅刊刻，在亡清以後仍舊續行傳統價值的維護及個人認同的鞏固，並在傳統文化脈絡之下獲致個人定位與身心的安頓；在異地風物的書寫之中，體現了個人對舊鄉亟欲回返的渴望。他們在殖民地時期的諸種創作與宣示，亦可視為一種時代的異質聲音。

民初遺民文人的樣態頗多，各自有其不同的政治態度以及立場主張，難以用齊一的標準劃分。如果說不同的世代遭逢同樣的歷史變化都擁有各別的理解與詮釋，汪兆鏞年過半百始遭逢變亂的經驗感受自然和汪精衛這一代有所不同，影響了他對世界變化的認識與解讀；身為長子的責任亦影響著他的抉擇。本文欲闡述的「遺民風景」，僅是民初當時的某一種遺民樣態。目的除了想展示當時被他人視為舊世界遺骸的遺民文人，在生命遭逢裂變的動亂流離中，如何通過記述與生命牽絆繫連的周遭物事，以求得心之所安外，以「風景」為名，是以遺民群體作為一種景觀，欲藉由本文的分析呈現當時清末民初當時諸種遺民型態中，這一類往來殖民地的遺民遷徙現象。其次是從這些遺民透過兩地的比較、對望與凝視，在異地回想、描繪且架構故鄉風貌的過程中，看到他們如何詮釋所見異地的風物地景，並從中覓得與故鄉的聯繫。

向來的遺民研究都集中在原本屬於上層文人官僚在改朝換代後的失落，卻少見關注汪兆鏞這一類的中下層文人在時代的夾縫中求生存時，個體心境的改變。本文以民初當時避居澳門的廣東文人汪兆鏞為研究對象，通過「流離」與「回返」這一組概念，首先概述這一批遺民的形成背景，繼而論及汪兆鏞的遺民論述與他刊刻輯錄師長典籍背後所展現的意識。最後分析汪兆鏞詩詞中對廣州原鄉眷念，以及地景

歷史的考察，希冀通過汪兆鏞的個案研究，反映出另一種南來文人的遺民型態。

二、典範的尋索：遺民的自我詮釋與自我表白

（一）遺民意識的凝聚：學海堂的背景概述

廣東遺民之所以在民初能成為另一個僅次於上海遺民的群體，與清代中後期的廣東整體學術發展有關。廣東位處帝國的南方邊陲，自古以來即被以南蠻或化外之地視之。嶺南學術亦因距離江南等文化薈萃之地較遠，即便有陳白沙（1428-1500）等著名學者，但始終是鳳毛麟角，整體學術風氣並不興盛。清代當時廣東出身的士人科舉及第的人數亦難以和文風鼎盛、士人薈萃的江南地區相提並論。¹⁰這種情況從阮元（1764-1849）於嘉慶 22 年（1817）赴廣東任兩廣總督後產生了轉變。他有感於當時「粵中學術不盛」，憑藉著當年任浙江學政創辦書院的經驗，在廣州設置了學海堂，並延攬了一批江浙學者，延續當年江南詁經精舍的考據學風。¹¹這群學海堂的學人也通過江浙學術的吸納、接受與轉化，確立了他們在廣州學術文化圈中的菁英地位。¹²學海堂既有官方支援，又有廣東當地仕紳的奧援，加上學長皆為當時知名大儒，如張維屏（1780-1859）、吳蘭修（1789-1839）等人，從而能在創立後不

¹⁰ 詳細論述可見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頁 165-166。以及 Benjamin A. Elman, "Qing Dynasty 'Schools' of Scholarship", *Ch'ing-shih wen-t'i*, vol.4, No.6, pp. 1-44.

¹¹ 關於學海堂與今文經學的關係，可參見〔美〕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撰，車行健譯：〈學海堂與今文經學在廣東的興起〉，《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006.3），頁 13-20。艾爾曼在《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書中也說到：「杭州的詁經精舍和學海堂儘管試圖推進 18、19 世紀之際儒學教育的發展，但仍然是乾隆時期江南各地書院接受的漢學教育的代表和發展產物。」同樣指出學海堂的授課內容大抵移植自江南考據學而來。〔美〕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頁 91。

¹² Steven B. Miles, *The Sea of Learning: Mobility and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Guangzhou*,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61-163.

久即與當時廣州的粵秀、羊城書院等舊式書院相互抗衡。¹³由江浙發展而來的考據學的方法也被這群學海堂文人拿來應用在廣東歷史文化的考索，凝聚了這批廣東文人的地域意識以及文化歸屬與認同；而在清亡以後，這樣的認同結合了文化傳承的使命感，成為廣東遺民自我認同的一部分。

其次，學海堂師友之間的交流活動頗為頻繁。據《學海堂志》記載，當時學海堂中「雅集」一事，是以阮元的壽辰為雅集之始，而後逐漸演變為堂內師生相互交流的場域。其中提到：「築堂以來，歲有小集，講禮於斯，會友於斯，來日無涯，宜詳時序，志雅集。」¹⁴雅集包括了上巳花朝、中秋坐月、九月賞菊、冬至觀梅等。透過「魚鳥相親、花木成列」的實景遊賞，賦詩唱和，除可以培養學生文學層次的情意感知以外，亦有聯絡師生情誼的功能。這種教學型態也成為了學海堂人日後在政治、社會或教育層面得以相互奧援的基礎。而在學海堂以外，這些門人亦有私下的酬唱聚會。如汪兆鏞即曾在 1885 年梁鼎芬罷官南歸之時，邀約同門共聚於學海堂與菊坡精舍。

汪宗衍〈雁來紅圖卷詞錄跋〉即記錄了本次的聚會：「光緒乙酉（1885）十一月，梁節庵丈鼎芬罷官歸里，先伯莘伯先生，招同楊叔嶠丈銳、王子展丈存善、朱隸垞丈啓連、陶子政丈邵學，集越秀山學海堂，酒半，過菊坡精舍。時雁來紅盛絕，梁丈首倡此詞，先伯因囑余子容丈士愷繪雁來紅圖，各題所為詞於後。翌年，徐巨卿丈鑄、文道希丈廷式、易實甫丈順鼎、石星巢丈德芬，與家大人（汪兆鏞）咸有繼聲。時葉南雪先生衍蘭以詞壇老宿，亦欣然同作，陳莘階丈慶森則戊戌秋補作，俱裝池成冊。」¹⁵此一聚會的與會者隱然體現了學海堂門人彼此的交誼網絡，其中汪兆鏞、梁鼎芬以及易順鼎等人，更是日後知名的廣東遺民文人。

林志宏曾指出廣東遺民特徵為：「這群遺民（學海堂）其實和清季東塾學派的關係密切。眾所周知，東塾學派的創始，以陳澧主持學海堂學長為標記。嗣後張之洞

¹³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頁 170-180。

¹⁴ 趙所生、薛正興主編：《中國歷代書院志》（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頁 301。

¹⁵ 清·汪宗衍：〈雁來紅圖卷詞錄跋〉，載於清·夏敬觀：《忍古樓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4807。

(1837-1909)擔任粵督期間，繼承學海堂的流風遺緒，創辦廣雅書院，又陸續培養出很多士子，使得該地的學術風氣更趨特盛。透過了同鄉情誼與師友門生的關係，這群士人非惟在清季時相互聯繫，紛紛登躋朝廷中央，後來還互通聲氣。直迨清帝遜位，因為有著共同認可的政治態度和價值觀，他們構成社會學家所謂的『社交圈』(social circle)，彼此產生凝聚力，變成堅持忠清的遺民。」¹⁶既然這群遺民文人早年交往已如此頻密，清亡之後，同為舊傳統的擁護者的他們，基於同樣的價值理念而互通往來亦不足為奇。現在為人所知的民初廣東遺老如陳伯陶(1855-1930)、梁鼎芬(1859-1919)、吳道鎔(1852-1936)、張其淦(1859-1946)等人，亦都是出身於學海堂者。

總之，廣州學海堂作為當時廣東學術重鎮，在清亡之前提供了這群人熟悉傳統學術以及相互交流的場域；在清亡後，持續凝聚著擁有同樣政治價值與對傳統學術堅持的文人。相對於接受西方新式教育的那批文人，「中學」成為了這一群遺民文人的自我標誌，是個人生命與學術歷程的集結。對傳統「中學」內涵價值的再確認，古籍書冊以及地域前賢事蹟的蒐集考察，便成為清末民初廣東文人自我實踐的新場域——在科舉不再能提供傳統文人仕進的保障、新舊的體制間仍存在著諸多扞格的當下，這一批民初廣東遺民藉以維繫彼此的存在。汪兆鏞的學術著作或詩詞創作，亦須在此一背景下始能理解。

(二) 定軌：遺民的自我詮釋

1、廣東前賢的遺民典範——屈大均(1630-1696)

遺民文人身處於時間的夾縫中，在意識到過往已然滅失的同時，也逐漸體認到人勢必走向凋零的命定。為前朝守節一事固然為文人的自我抉擇，然而僅依憑著此種信念，卻也不免出現躊躇疑懼的時刻。在與當時同為遺民者相互慰藉的同時，他們也從前代先賢中尋覓典範所在，擷取其中有意義的環節。從歷史遺跡或是鄉邦先賢事蹟的記錄與考索，遺民在書寫、追認與情感投射的過程中，聯繫異代遺民的共

¹⁶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清遺民與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的轉變》，頁 57。

感，轉化自身「遺」或是「弱音」的地位，而代之以歷史文化的見證者與承繼者。因此，正如同宋、明遺民多透過書寫表彰自身心志，清末民初的遺民也同樣地有書寫、尋索、編纂與蒐集歷代遺民資料，以寄託現實情懷的傾向。

汪兆鏞詩歌中對明遺民頗多留意，如嶺南三大家的屈大均（1630-1696）、葉佩蘭（1629-1705）、陳恭尹（1631-1700），乃至遺民僧人函罡、澹歸等人，都曾為汪兆鏞歌詠的對象。這種對鄉邦遺民傳統的標舉，〈重刊《海雲禪藻》序〉中即清楚提到：「吾粵士夫夙尚氣節，明社既屋，義師飄起，喋血斷脰而弗顧者踵相接」¹⁷，以明末清初的遺民海雲禪師為例，極力表彰明末清初廣東遺民文人為抗清而堅守不屈的志節。¹⁸其中又以屈大均最為汪兆鏞所傾慕，在詩中屢屢提及其生平，甚至引為同調。他替陳伯陶《勝朝粵東遺民錄》一書的題辭中即有「淒絕翁山老，浮湛意未闌」（之二）、「憶昔錦巖畔，雪聲尋故堂」（之三）¹⁹，描述屈大均浮沈半生，壯志未酬，而長憶恩師的情態。不過，汪兆鏞對屈大均生平最為詳細的敘述，仍屬〈番禺令陳樾訪得屈翁山墓，為之起冢建碑，摹象築亭，繪「沙亭訪墓圖」徵詩〉一首。試引之如下：

紹武行宮秋草沒，端谿谿水夜嗚咽。誰問沙亭土一杯，寒燐碧盡萋宏血。沙亭詩人老諸生，豈為空驚殉國名。孝陵三謁黯王氣，錦巖一去悲雪聲。北度秦隴下吳會，入越浮湘涉海外。遠遊自賦駢虬螭，起義將謀復冠帶。子房初從假楚王，歸去築園名祖香。埋衣木末古亭畔，藏髮黃龍仙洞旁。裹屍馬革平生志，有老母在何敢死？生壙銘成意慨然，墓廬事避身休矣。遺壟湮沈二百年，寶珠峰麓堆蒼煙。三家騰蹕誦詩句，四松蕭瑟餘荒阡。……幽光顯晦

¹⁷ 清·汪兆鏞：〈重刊《海雲禪藻》序〉，收入《微尚齋雜文》（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卷2，頁2下。

¹⁸ 函罡（1608-1685），字麗中，別字天然，號丹霞老人，為明末清初嶺南高僧。廣東番禺人。明亡，一度避亂西樵。後入番禺雷峰隆興寺（後易名海雲寺）。汪兆鏞另有〈媽閣山麓禪房觀天然老人為解虎監寺書直幅〉詩。見清·汪兆鏞著，鄧駿捷、陳業東編校：《汪兆鏞詩詞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頁30。

¹⁹ 案：錦巖位於越秀山，為明末粵地大儒陳邦彥（1678-1752）設堂講學之所，屈大均亦出於其門下。著有《雪聲堂集》。汪兆鏞有〈錦巖謁陳巖野先生祠〉詩。見清·汪兆鏞著，鄧駿捷、陳業東編校：《汪兆鏞詩詞集》，頁65。

有前定，白園猶傳舊題詠。海桑寄慨畫圖中，卞瑩禁樵永輝映。²⁰

本詩為汪兆鏞應陳樾徵求「沙亭訪墓圖」題詩而作者，屬於題畫詩的性質。屈大均，字翁山，廣東番禺人。為明末清初遺民代表。順治3年（1646）清軍攻陷廣州時，屈大均之父攜家返番禺沙亭避禍。7年（1650），清兵再圍廣州，屈大均為避禍，於番禺縣雷峰海雲寺拜天然老人為師，此後以化緣為名雲遊四海。「平生好遊，於海內之地，近而嶽瀆，遠而沙塞龍荒，足跡亦幾遍矣。」²¹老後移志於廣東文獻、方物、掌故的收集編纂。屈大均鄉土關懷濃厚，曾道：「廣東者，吾之鄉也。不能述吾之鄉，不可以述天下。文在於吾之鄉，斯在於天下矣。」²²又築「懷沙亭」，「一以不忘吾鄉，以不忘無祖；一以不忘白沙，以不忘三閩。」²³後編成《廣東文集》、《廣東文選》、《廣東新語》以及《皇明四朝成仁錄》等書，記錄了廣東的文人著述、地理風情與民俗文化等層面。以鄉邦的傳統的記敘為本體，通過地域風土人文的重述，涵養對家國天下的關懷，寄託個人對吾鄉斯土的情感。

詩中首先由屈大均的沙亭舊墳談起，逐步描繪出屈大均的「忠君」形象。包括：遭逢異代鼎革，三度訪謁明孝陵的忠義；終身不忘師恩的情態；為抗拒新朝，北遊邊地，欲惕勵精神，訓練筋骨，以圖謀恢復的刻苦；最後識破吳三桂僭竊之心，隱居番禺沙亭，潛心著述等幾個層面。由此，屈大均緬懷故國、圖謀復興且終生不忘前朝的忠君情操亦隨之清晰。除此之外，汪兆鏞對屈大均並未選擇「殉死」抉擇一事，也表現出了同情的理解。事實上，殉死與否實非遺民表現忠貞的唯一選項，無論選擇何者，都存在著不足為外人道的諸種考量與幽微的心理轉折。對屈大均而言，不選擇殉死背後存在著更遠大的懷抱——復國盡孝，是為了「起義將謀復冠帶」，也

²⁰ 清·汪兆鏞著，鄧駿捷、陳業東編校：《汪兆鏞詩詞集》，頁83。

²¹ 清·屈大均：〈沙子遊草序〉，《翁山文鈔》，收入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第3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卷1，頁293。

²² 清·屈大均：〈廣東文選自序〉，《翁山文外》，收入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第3冊，卷2，頁42。

²³ 清·屈大均：〈懷沙亭銘序〉，《翁山文外》，收入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第3冊，卷11，頁189。

是由於「王陵有母髮垂白，遇難不能供子職」。²⁴當這樣的目的無法達成時，「墓廬事避身休矣」，隱遁於世便是他自我實踐的方式。汪兆鏞這裡談到屈大均本有「裹屍馬革平生志」的抱負，卻因「有老母在」，選擇隱居此一不與新朝相往來的消極方式表達其遺民情操。

與明清之際的遺民相同，汪兆鏞在堅持這個前朝遺老身分的同時，也必須為殉死與苟活兩種道德選擇進行辨說。為國殉死作為忠君理想的自我實踐形式。汪兆鏞一方面既為劉師勇或是辛亥當時殉清而亡的秀才們作序，稱許這些為殉死為國、大義凜然的「氣節之士」；另一方面，他也對自己未能殉死一事感到些微不安，而有「兆鏞草間偷活，何足以序先生之詩」這一類的文字。²⁵遺民徘徊於兩種抉擇之間，情緒矛盾而難以自解。但與屈大均相同，身為一家之長的他也有相應的家庭與社會責任，無法隨意拋卻。於是，他消極地將個人與新朝之間的事務劃清界線。從遙奉溥儀，在年譜中亦以干支紀年，以表不入民國之志，並婉謝所有請求於民國任事的邀請，都能看到他不願意與新朝有絲毫聯繫的心志；而他在殖民地的寓居生活，亦可以視作遺民「隱」於當世的具體實踐。

此外，汪兆鏞在吟詠明遺民的詩篇之後，也不時會加以小注說明屈大均的交遊關係。如〈湖上口占〉兩首之二「此日圖經皆寂寂，誰將風節表幽湮」的下注即有：「湛若（案：即孫鄭露（1604-1650））、翁山皆至湖上，有詩，志西湖者均未載。」²⁶為明遺民作品不為人所知而抱屈。又有〈題澹歸和尚《惠州準提閣詩卷》〉二首之二：

「下筆如風雨，縱橫走百靈。死心老行腳，齋恨小朝廷。澹宕江湖晚，芳菲薇蕨青。清游誰繼迹，代汎有新亭。」其後小注為：「屈翁山、陳獨漉諸人至惠州，有〈和王紫詮使君代汎亭〉詩，在澹公圓寂後也。」²⁷

本詩為汪兆鏞為題澹歸和尚詩集所作。澹歸（1614-1681），俗名金堡，字道隱，本名浚，更名堡。順治年間曾起兵抗清，桂林城破後落髮為僧。後入天然函毘門下，

²⁴ 陳永正：《屈大均詩詞編年箋校》（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頁1095。

²⁵ 清·汪兆鏞：〈香山李邠雨先生遺詩敘〉，《微尚齋雜文》，卷2，頁4上。

²⁶ 清·汪兆鏞著，鄧駿捷、陳業東編校：《汪兆鏞詩詞集》，頁57。

²⁷ 清·汪兆鏞著，鄧駿捷、陳業東編校：《汪兆鏞詩詞集》，頁81。

更法名為今釋，於廣州雷鋒寺修行以終。王紫詮即王煥（1651-1726），清初當時有文名，時任惠州令，主政期間建有代汎亭。與嶺南三大家屈大均、陳恭尹與梁佩蘭，以及朱彝尊等人亦有交遊。惠州為廣東當時抗清最力之所之一，遺民文人聚集於此者亦多。汪兆鏞為澹歸和尚的詩卷題辭，除帶有為遺民作序的況味，彰顯遺民情操歷久猶是以外，亦有自詡為遺民精神的承繼者之意。詩中末句的「清游誰繼迹，代汎有新亭」，表面上雖然指的是澹歸和尚的遺民精神有王煥、屈大均與陳獨漉等人承繼，但亦是汪兆鏞試圖將個人鑲嵌入遺民抒情脈絡，用以表示個人對先賢的承繼與效法。

這樣的意圖亦見於詩詞的用典。以「薇蕨」（或作「蕨薇」）一詞為例，此一典故向來與歸隱或隱逸等概念連結。如孟郊「野策藤竹輕，山蔬薇蕨新」，或溫庭筠〈贈隱者〉「茅堂對薇蕨，爐暖一裘輕。……不問人間事，忘機過此生」等等句子，大抵是將薇蕨視作山蔬野菜一類，藉此抒展個者安於山林田舍之間，清閒恬適的自得心境。而在遺民詩中，特別是屈大均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到其中的「薇蕨」一詞多與伯夷、叔齊不食周粟的典故相涉。如作於北遊之際的「求仁在薇蕨，書弑即春秋」（〈夷齊廟作〉）、「薇蕨先公節，桑麻鄭子村」（〈涇陽訪王大春〉），或是於東莞春山草堂的「先人薇蕨在，采采暮雲邊」（〈春山草堂感懷〉）等句子，既是以古人典範自勉自勵，同時亦表達了詩人對遺民典範的認同與呼應。²⁸既然汪兆鏞詩下小注中提到屈大均的事蹟，在下筆當時聯想到屈大均的詩作亦為自然。汪詩中的「芳菲薇蕨青」在此即是遺民節義恆存的象徵。由此延伸，「蕨薇 / 薇蕨」亦能指稱遺民文人群體。屈大均〈知己〉一詩即有：「天意猶相惜，先朝一布衣。平生雖未負，白首竟何歸。故國餘禾黍，空山少蕨薇。勞勞多著述，老去總知非。」²⁹屈大均感於遺民同道漸稀，轉眼白首，茫茫不知所終，終將消褪於時間流逝間，故不免對著述本身是否能夠真實呈現個人心曲感到懷疑。以布衣而終的孤懷寂寞與自我懷疑同樣見於汪兆鏞詩中。如〈老病〉：「老病殞然一布衣，萬緣芻狗付歛歔。死哀未必生能樂，今

²⁸ 引詩分見於陳永正：《屈大均詩詞編年箋校》，頁 190、197、320。

²⁹ 陳永正：《屈大均詩詞編年箋校》，頁 639-640。

世何曾昨果非」³⁰，即陳述了遺民的老病之嘆與茫然之感。〈九龍真逸《勝朝粵東遺民錄》題辭〉一首最後亦抒發了：「野史亭何在？沈霾亦可哀。孤懷守薇蕨，潛景出蒿萊」的疑慮。³¹此處「薇蕨」，當然是指忠義大節；遺民無法抵抗時光的磨蝕與消耗，亦不能求知己於當時。「孤懷」所守，僅能是一份不為世人所理解的寂寥，隱約透露出因為忠於自我的選擇而孤獨的必然。誠如屈大均詩中所自陳的：「隱忍終酬國士知，深沉不必時人識」，遺民文人徘徊於仕／隱、生／死的種種抉擇，臨歧徬徨的內在轉折與痛苦難以盡訴。汪兆鏞之所以不時在詩文中提及屈大均的事蹟詩文，或是在小注中援用屈大均的文獻著作，除了鄉邦情誼以外，即是從屈大均他身上預見了自身的未來——淹沒於荒煙蔓草之中，幽光顯晦任由天定，唯有期待來者能夠同情理解。對照汪兆鏞與屈大均兩人生平。他們同為廣東出身，遭逢異代鼎革、家國覆滅，又因避難不得不遠離家園，最後僅能寄情於地域文獻的編輯。兩人生平的種種類似性讓汪兆鏞對屈大均除了崇敬以外，更有一種惺惺相惜的理解與同情。遺民在當世難覓知音、不為眾人理解之際，僅能轉向取法古人先賢，引為同調典範，才能夠在遺民寂寞而難以被人理解的餘生中，繼續踽踽獨行。

附帶一提的是，雖然汪兆鏞筆下的屈大均形象頗為豐滿，但卻獨獨遺漏了屈大均在北遊之時曾大力主張正名，力辯華夷兩者不可混同的論說。³²以汪兆鏞對屈大均詩文的嫻熟來看，這種省略並非偶然，而是汪兆鏞刻意迴避而有所選取的結果。

2、倫常道德的再重申：遺民錄的撰述

關於廣東文人的遺民錄著述，早在汪兆鏞之前，陳伯陶（1855-1930）已經以現處的地域為中心為遺民身分與正統性表述的起點，進行廣東文史記錄的著作，而編有《宋東莞遺民錄》、《勝朝粵東遺民錄》、《明季東莞五忠傳》等書。³³內容主要記

³⁰ 清·汪兆鏞著，鄧駿捷、陳業東編校：《汪兆鏞詩詞集》，頁 71。

³¹ 清·汪兆鏞著，鄧駿捷、陳業東編校：《汪兆鏞詩詞集》，頁 66。

³² 如屈大均的〈唐晉王祠墓三首之一〉「從來賜姓者，獨有晉王賢」，與〈和柏林弔古〉「復唐豈可欺天下，繼統何曾出大宗」，皆是堅持華夷血統不可混同之代表。分見於：清·屈大均：《翁山詩外》，收入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第 1 冊，卷 5，頁 528；第 2 冊，卷 11，頁 915。

³³ 據汪兆鏞自訂年譜記載，丙辰（1916）汪兆鏞過香港九龍訪陳伯陶，陳氏出示《勝朝粵東遺民錄》，

述宋明之際的廣東遺民的事蹟，強調廣東一地文人忠於前朝的傳統，表明自身為亡清守君臣大義的抉擇為前有所承。汪兆鏞則是在 1916 年 2 月時廣州滇桂軍交關，決定暫時舉家寓居澳門荷蘭園。途經香港拜訪居住於九龍的陳伯陶，並拜讀了《勝朝粵東遺民錄》一書。³⁴或受到陳伯陶的啟發，汪兆鏞在其後也開始關注明清以外的歷朝各代廣東遺民。在為這些前賢先哲作傳紀錄的同時，也試圖從中找尋足以為遺民典範的朝代與對象。³⁵《元廣東遺民錄》即是在此一背景下產生者。

關於廣東文人撰作遺民錄的目的，高嘉謙對遺民地景的論說可為代表，他說：「在夷夏之辨的前提下，前者（南宋覆亡）是漢人政權被侵吞，後者是異族政權（清室垮臺）的淪亡。……陳伯陶在英殖民地的九龍……透過遺民正統的確認，代換了漢人或異族政權的認同矛盾。」³⁶重述九龍的歷史軌跡、連接厓山記憶已確認遺民正統的敘事策略確實解釋了宋臺秋唱背後隱含的政治心理；然而地域遺民錄的纂作，除了遺民正統確認以外，尚有針對當時社會亂象，提出解決之道的意欲在其中。意即，遺民文人們欲透過地域鄉邦的傳統繫連前代遺民精神，以倫常道統取代夷夏論辯所可能產生的曖昧與夾雜。辛亥之後的社會狀況，猶如汪兆鏞所觀察者：「辛亥變後僅數閱月，海內土崩瓦解，莫知所由，凌夷至於今日，異說蠱起，人心風俗之壞如水益深，如火益熱。」³⁷有鑒於倫常禮教的毀壞、異說叢生而道德敗壞的風尚，繼而他在〈說忠〉一文談到：「為人臣者止於忠，此千古之大義。近世詖辭邪說乃有以忠為非者，真名教之罪人也。」³⁸以為君臣忠義為古今不變之大義，而不因世異時移而有所變更。辛亥以後紛然繼起亂象，是由於那些以忠義道德為非的「詖辭邪

並採獲陳文忠、張文烈及陳志愨行狀。汪兆鏞亦有題辭之作。又〈元廣東遺民錄序〉也談到「九龍真逸輯《宋東莞遺民錄》、《明粵東遺民錄》已刊行」，兩人交往之密切不難想見。清·汪兆鏞著，鄧駿捷、陳業東編校：《汪兆鏞詩詞集》，頁 173。

³⁴ 清·汪兆鏞：《清微尚老人兆鏞自訂年譜》，頁 37。

³⁵ 《元廣東遺民錄》的體例分為上下兩卷，是仿明人程敏政（1446-1499，字克勤，中年後號篁墩）的《宋遺民錄》，以阮元《廣東通志》、各縣志書等為基本材料，輔以元明時人的詩文集所記，旁摭遺聞軼事加以裁剪，人各一傳，後人評論、題詠附於傳後。

³⁶ 高嘉謙：〈刻在石上的遺民史：《宋臺秋唱》與香港遺民地景〉，《臺大中文學報》41（2013.6），頁 299。

³⁷ 清·汪兆鏞：〈香山李邨雨先生遺詩敘〉，《微尚齋雜文》，卷 2，頁 3 下。

³⁸ 清·汪兆鏞：〈說忠〉，《微尚齋雜文》，卷 1，頁 4 下。

說」妄人，不辨忠義而僭越名教秩序的結果。從而，為匡正世道人心、以辟邪說謬論，倫常綱紀的維護則勢在必行。因此，汪兆鏞《元廣東遺民錄》的撰作，除了陳伯陶的影響外，其實也是汪兆鏞所念茲在茲的道德準則——即忠君一事的具體實踐，希冀藉由遺民錄所體現的先賢典範，教化人心；在建立遺民的正當性以外，並能消彌當時華夷之論的矛盾。汪兆鏞給簡朝亮的信中明確地宣稱：「拙著《元廣東遺民錄》二卷，乃激憤於謬悠之論而為之。」³⁹並在序中再次重申個人立場：

說者謂：宋明二代主辱臣死，或躬采薇之節，大義觥觥，照耀史策；元順帝國亡北奔，其時宜少忠節之士。蒙竊以為不然。夫君臣之義，萬古常昭，若時移世易，輒躡跡新朝，覲顏而不知恥，甚至持謬說以自解，此何異倚門市倡、朝秦暮楚之為耶！⁴⁰

汪兆鏞此段言論是為當時眾多輿論以「夷夏之別」為據，對清遺民為異族守忠之事多所批判一事而發。夷夏之分作為宋明遺民敘事的重要內容，是以種族、地域、文化傳統的優劣等方面劃定彼我的不同，推導出身為「夏」文化的正統承繼者，斷然無所謂屈就「夷」的理由，建立起自身遵奉舊朝的正當性。⁴¹誠然，這種奠基於文化優位的夷夏之論確實提供了由漢人政權過渡到異族統治的宋明遺民一套簡便的操作方式，然而用來解釋異族統治的清政權的話，便出現無法契合情狀。有鑑於此，汪兆鏞選擇回溯歷史，將目光置於元遺民這個與自身有著同樣處境的群體。他在序言中首先反駁以為宋明遺民為主守節為大義，而認定不必為元代守忠的觀點。對他而言，君臣大義是亙古不變的倫常分際，不應因為種族相異而有所不同。如於改朝換代之後便改事新朝，卻託言種族自我開脫者，與娼門賣笑一類送往迎來之人並無二致，痛斥「改柯易葉」者深為可恥。

³⁹ 對於當時輿論的批判，汪兆鏞屢次以謬悠之語加以反駁。在詩中屢次提及「神州莽沈沈，北望涕如雨。危素恥老臣，子英戀故主。大義炳千秋，痛心謬悠語」又，自序最後亦有「固不必盡效宋明人所為，而乾坤正氣，常存於嶺海之間，足以後先輝映，豈持謬說所能淆惑天下後世哉？」除批判針對當時的輿論，強調不必如宋明遺民殉死之餘，同時也是再次表彰對廣東儒生的忠義傳統。清·汪兆鏞：《元廣東遺民錄》（壬戌年刊本，1923），〈序文〉，頁4。

⁴⁰ 清·汪兆鏞著，鄧駿捷、陳業東編校：《汪兆鏞詩詞集》，頁174。

⁴¹ 關於清遺民的夷夏之防論述，可參見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清遺民與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的轉變》，頁149-154。

這種對倫常的重視，也同樣出現在〈辛亥三秀才行序〉。序文云：「辛亥之變，……江陰趙煥文秀才（彝鼎）遭難，痛憤不食，三日未殊，手書絕命辭，大旨以朝廷養士三百年，豈容謬倡排滿之說。書畢，至三賢廟自經死之。皆一介諸生耳，大節凜凜如此，為賦〈三秀才行〉。」⁴²序中紀錄辛亥變後三位秀才為國殉節的軼事，藉趙煥文之口再度駁斥當時排滿之說，並讚揚三人雖僅為諸生，卻仍銘記舊朝養士之恩澤，為國殉死以示忠誠。以此反襯不顧前朝養士之恩，「蔑棄倫紀」而倡排滿之說者是為「妄辨種族」、欺騙世人的作法。汪兆鏞對傳統倫常綱紀堅決自守的態度，以及對未能守節，且倡謬說之人措辭的嚴厲可見一斑。

另外，汪兆鏞也在序中比較了宋明遺民與元遺民面對異代變異時的態度。他歸納道：「宋明遺民多志圖恢復，恆千回百折，備歷艱苦。元人無之，然堅辭徵辟，不履新軒已為歸潔其身：此編采錄，惟以不仕不試為斷。」⁴³相較於宋明遺民奔走圖謀政治恢復的積極作為；元遺民為前朝守節的方式是以堅辭仕宦，不履新軒等消極的方式，實踐儒家「獨善其身」的道德理想，以表現個人的德性品格。與此同時，同為學海堂專課肄業生的張其淦（1859-1946）也考訂並蒐集了明代與元代的遺民事入詩，寫成《明代千遺民詩詠》三十卷及《元八百遺民詩詠》二冊。汪兆鏞也為其題辭，有詩如下：

夷、齊餓死曾何怨，豈意民稱直到今。秀野堂前羅拜者，淒涼猶有好名心。
我朝仁義得天下，抗節群公尚激昂。貧賤江湖甘隱世，沈吟誰識老柴桑。劍
公不滿竹垞翁，獨與祈年交最篤。蒯緱館傳瓊瑤辭，嶺海徵文比眉目。宋明
風節高千古，我慕倪、徐一輩賢。祇賸嶺南稽軼事，愧君三復有宏編。〈東
莞張豫荃《詠明遺民詩》題辭〉⁴⁴

汪兆鏞在此由叔夷、伯齊的不食周粟談起，而後至明遺民與王漁洋等人，概略地回顧了歷史上以遺民著稱的人物，藉此稱許張豫荃勉力為詩的同時，亦是對前朝的忠

⁴² 案：汪兆鏞於乙亥（1935）所作的〈鎮洋沈秀才遺詩序〉，也是紀念一名秀才沈徵蘭在辛亥變後自盡殉國之事。引文見清·汪兆鏞著，鄧駿捷、陳業東編校：〈辛亥三秀才行序〉，《汪兆鏞詩詞集》，頁63。又清·汪兆鏞：〈鎮洋沈秀才遺詩序〉，收入《微尚齋雜文》，卷2，頁4上-頁5上。

⁴³ 清·汪兆鏞：《元廣東遺民錄》，〈凡例〉，頁5。

⁴⁴ 清·汪兆鏞著，鄧駿捷、陳業東編校：《汪兆鏞詩詞集》，頁82。

貞與元遺民的仰慕的重申。開篇以伯夷、叔齊的典故為始，指出兩人當時的抉擇並非因為好名而為，而是出於個人自由意志的結果。即便新朝以仁義得天下，都有一批不願入清的遺民甘願為前朝守節，力抗新朝，或以貧賤隱世終身。間接帶出了選擇成為遺民並非好名求利，而是有更深刻的人生實踐。換言之，個人眷戀前朝恩澤而決意為其守節的抉擇與新朝的優劣好壞本無絕對關係，而僅關乎個人志向以及自我實踐的心曲。等於是為當時不被理解的遺民文人提出辯護。從而最後他寫道：「宋明風節高千古，我慕倪、徐一輩賢」，指出宋明遺民之氣節無庸置疑，足以流傳千古，然而元遺民的倪、黃等人亦足以使人仰慕。這裡的「倪」是指元代南宗山水畫代表倪瓚（1301-1374）。明初朱元璋曾召其進京供職，堅辭不赴。曾作〈題彥真屋〉詩云：「只傍清水不染塵」，表示不願為官之志。他在畫上題詩書款亦僅用干支，而不用洪武紀年，以表不入新朝之意。徐，即指徐舫（1299-1366），元明間浙江桐廬人，字方舟，自號滄江散人。幼任俠，好擊劍、走馬、蹴鞠，工詩。後劉基受朱元璋徵召，邀之同行，徐舫荷蓑笠以見，酌酒賦詩而別。築室江邊，終老其間。汪兆鏞在《詠明遺民詩》題辭中卻仍不忘援引兩位「堅辭徵辟，不履新軒」的元遺民文人為例，藉此具體化自身所傾慕的遺民形象以及他個人對元遺民的同情與認同，亦呼應了他的《元廣東遺民錄》的纂作動機。

總之，汪兆鏞駁斥當時盛行的種族之說，而代之以儒家彰示的君臣綱紀倫常為超越種族界分，不因時間對象而有所改換的準則。既為自身「忠清」的正當性提出解釋，也強調了傳統文化倫常對匡定社會準繩、彌平動盪的重要性。這樣的主張反映出的是清末民初這批遺民文人對於典範追尋的渴切以及個人定位模糊的矛盾與焦慮。在世事的混沌以及己身定位的不明之下，倫常綱紀此一儒家傳統的教條，便成為他們得以攀附的支柱。記述這些在歷史上「失語」(voiceless)的遺民文人們，其實彷彿也是預見自己的未來也可能同樣處於歷史的失語狀態，為他人作傳記事的同時，也是為自己留下某些紀錄。

（三）每閱殘碑想古初：文獻器物的書寫與回顧

遺民的特徵之一便是時間的凝滯感。在生命的回顧、徬徨與踟躕之中，惟一得

以自寬自解之法，便是將自己投入得以繫連往日的事物之中，重新尋覓個人與往日的交會點。當個人已經無法改變改朝換代的事實，消極地逃避任何與新朝政治相關的聯繫，開始進行舊朝昔日的記錄與書寫，亦是一種無可奈何之下的積極作為。⁴⁵汪兆鏞的治學得力於學海堂的訓練，其師承、交遊幾乎全是以廣州學海堂為中心所衍生的人際脈絡。學海堂在汪兆鏞眼中既是個人記憶的集結處，同時也象徵著廣東學術的高點。從而，汪兆鏞在民國以後往返於澳門、廣州期間所從事一系列整理、搜集、抄錄，刊刻學海堂時期師長與友朋的作品，即是他連綴個人記憶，追緬學海堂的昔日學術風華的表現。

由附錄中的列表可以看到汪兆鏞開始從事文獻的整理與蒐集主要在辛亥以後，根據其內容可概略分為兩類：一類是陳澧著作的蒐集刊刻，另外一類則是廣州當地的出土文物的紀錄。汪兆鏞之所以專主於陳澧遺稿的整理，絕大多數是源自於陳、汪兩家的世代交誼。陳澧在為汪璪之父汪鼎所作〈山陰汪君墓表〉說到：「子璪與澧交好，以君所著筆記與王君蘊璘所為行狀請書其事於墓石。」兩家交往延續兩代以上，其關係之密切亦不難想見。⁴⁶也因為這一層關係，對陳澧的學問涵養極為推重的汪璪也讓子侄輩如汪兆鏞、汪兆銓（1858-1928）等人入學海堂從陳澧治學，奠定了日後師生間數十年的交往。龍沐勛曾以汪兆鏞「治經、治史，一以師說為歸」⁴⁷，亦是指出了汪兆鏞對陳澧治學方法的承繼。因此，汪兆鏞之所以選擇整理陳澧遺稿，除師生間的摯情以外，或許更源自一份「惜往日之云徂，哀大雅之不作，人間何世，失墜是懼」的傷懷。⁴⁸在時代的動蕩不定間，或許僅有竭力保存舊日學術，才是唯一的真實。⁴⁹

⁴⁵ 王汎森在〈清初士人悔罪心態與消極行為〉文中談到明末清初遺民文人堅不入城，以為抵抗的消極行為，是為「既然無法改變改朝換代的事實，便以消極的切斷社會政治聯繫來表達自己，是無可奈何中的一種強勢作為」。同樣的概念用到文獻材料的蒐集著述之上，即是以「立言」的傳統，對抗政治國體的鼎革變換。原文見王汎森：〈清初士人悔罪心態與消極行為〉，《晚明清初思想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頁230。

⁴⁶ 見清·陳澧著，黃國聲主編：《陳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240。

⁴⁷ 龍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詞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頁190。

⁴⁸ 清·陳澧著，黃國聲主編：〈憶江南館詞後記〉，《陳澧集》，頁661。

⁴⁹ 這種對於陳澧師恩的緬懷與欲保存師長文獻的焦灼，亦可見於其他詩文中。如〈漫興〉「東塾渺緒

於是，辛亥以後，汪兆鏞在 1911 年至 1914 之間即利用幾次往返澳門廣州的機會拜訪當時居住於廣州的陳宗穎（陳澧四子，字孝堅，1855-1914），並從他那裡借入不少陳澧遺稿抄寫過錄。如汪兆鏞過錄陳澧手批《絕妙好詞箋》，書前即記有：「孝堅世兄出視東塾師評點本，用墨筆照錄一過。癸丑（1913）小除夕兆鏞記。」⁵⁰又《憶江南館詞》集前也有：「壬子（1912）秋，孝堅世兄出先生手定稿相眎，都凡二十五首，爰逐錄一遍。嗣採獲四首，皆為原稿所未載，附錄為集外詞。諸本字句有異同者，別為〈校字記〉一篇。」⁵¹除從陳宗穎處借來定稿校對字句異同而寫成〈校字記〉以外，汪兆鏞尚從題畫詩與其他材料中輯補了四闋詞，成為現在陳澧《憶江南館詞》的定本。另外，汪兆鏞還編定了陳澧的《讀詩日錄》與《公孫龍子注》，並由陳澧「為人書箠幅及傳鈔本」的作品中輯補了 13 首作品，與原先陳澧 239 首詩作「按年編次，按語以識之」，並兼有校記，編成《陳東塾先生遺詩》。直至晚年仍有與陳垣商討《東塾集》的再刻印等事務。⁵²

除此之外，汪兆鏞對廣東出土文物亦著力不少。在學海堂時期即有學長吳蘭修（1789-1873）以及梁廷枏（1796-1861）等人研究南漢的史地與金石，並出版了《南漢記》、《南漢金石志》等作品。麥哲維以為「這些學者使用考據學的方法從事地方文化考察，包含重建逸失的文本與找尋及使用碑銘以確認廣東在傳統歷史上的重要

言，撰杖憶猶昨」、「此心無所住，有夢到羅浮」以及〈過城南木排頭陳東塾先生宅故址〉「不盡王風蔓草思，沉霾嶺學失經師。……赤燁一怒成塵劫，欲訪遺書暗淚垂」等等，皆為顯例。也正因如此，當晚年他在澳門聽聞陳澧木排頭舊宅因大火被毀時，才有「聞之仆跌梯間，傷腰劇痛……臥床兩月始癒」。「仆跌梯間」作為一隱喻，陳澧舊宅被毀一事對汪兆鏞而言更是象徵其個人過往所信仰的學術，舊日的世界的全數崩毀，那些原以為可以保存良久、傳之後世的文獻學問都付之一炬。汪兆鏞當下的沉痛可想而知。見清·汪兆鏞著，鄧駿捷、陳業東編校：《汪兆鏞詩詞集》，頁 68、89。

⁵⁰ 清·陳澧評，汪兆鏞過錄，宋·周密輯，清·厲鶚、查為仁箋：《絕妙好詞箋》（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圖書館藏同治 11 年（1872）會稽章氏重刊本），〈目錄〉，頁 3 下。

⁵¹ 清·陳澧著，黃國聲主編：《陳澧集》，頁 661。

⁵² 汪兆鏞致陳垣函中記有：「《東塾類稿》，昔年見之，隨作隨刻隨刪，未為定本。廖澤群諸人編刻東塾集時亦多掇拾於類稿中者。……蓋丁卯（1927）之亂，東塾故宅及所刻朱書版片悉付一炬。江浙友人屢託購《東塾集》而不可得，圖書館印行廣雅書局所刻諸書，儲資即可為刻《東塾集》之費，不思無款，而遲遲未果，世事可嘆如此。」汪兆鏞著力於陳澧遺稿刊刻印刷的用心可見一斑。（1933 年農曆 10 月 17 日）見清·陳垣著，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北京：三聯書店，2010），頁 472-473。

性。」⁵³是以古物金石的考據研究，強化地域歷史的文化知識並建立廣東學術的正統性與重要性。汪兆鏞承繼了此種治學方式，早年即對金石之學展現出極大的興趣，亦曾負責《番禺縣續志》中「金石」一門的考訂工作。⁵⁴和當時學海堂人欲借金石考證建立廣東的歷史敘述不同，汪兆鏞在《碑傳集》、《廣州城殘磚》等著作中，除了表現金石考證的功力外，毋寧是想透過碑銘、殘磚的紀錄保存某些即將隨著地景消逝而遺忘的風景。《廣州城殘磚》的書序即可視作汪兆鏞欲藉由廣州殘磚成書始末的書寫，抒發自身所認知的世界逐步凋敝的愁緒。序云：

整理廣州拆城殘磚拓片，並曩所考證，彙裝一開，題曰《廣州城殘磚》。……辛亥後，於戊午、己未、庚申間，各城盡毀焉。余與盛濠堂徘徊頽垣敗壁間，每見殘磚有文字隱起，日挈奚僮檢拾。工匠初以為訝，繼而居奇，好事益爭攫，遂不克過問，故所得只此，而篝鐙墨拓、簡書考證，頗以自慰。……回憶恍如昨夢，而濠堂今已墓有宿草矣。……匪惟寄蕪城之悲，攄黃墟之感，於五羊掌故，亦稍可參稽。玩物喪志之譏，所弗辭也。⁵⁵

廣州古城於 1918 年以來，在政府拆牆修路的作為下，絕大多數古城牆垣皆夷平為路。至 1921 年孫科任市政廳長，由於都市計畫的關係，明清兩代以來的城門城垣盡數拆毀，廣州舊城自此不再。⁵⁶汪兆鏞序談到的即是 1918 年以降的拆城之事。當時汪兆鏞與友人盛濠堂一同蒐集整理其上有文字殘留舊城碎片，辨明年代源流始末，以為紀錄。惟期間引起了工匠與好事者的好奇，後殘碑遂不可再得。直至 1932 年汪兆鏞才正式將這批殘磚拓片整理完畢，匯集之前的考訂文字，而定名為《廣州城殘

⁵³ 按：汪兆鏞的詩序中也曾提及南漢與廣州城間的關係，中云：「宣統初，廣州城北墾地，得〈隋徐智竦墓志〉，稱葬南海甘泉北山，隋時地屬南海也。南漢於其地闢甘泉苑，今小北門外稻畦菜壠即其遺址。」見清·汪兆鏞著，鄧駿捷、陳業東編校：《汪兆鏞詩詞集》，頁 83。此處麥哲維的原文為：The kaozheng(考證) methods that the academy employed investigation of local culture includ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lost texts and the search for the use of metal and stone inscriptions to verify accounts of Guangdong that appeared in standard histories.」Steven B. Miles, "Rewriting the southern Han (917-971): The Production of Local Cul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Guangzho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2.1 (Jun. 2002), p. 41.

⁵⁴ 清·吳道鎔：〈汪懔吾廣州城磚跋〉，收入《澹齋文存》，1942 年線裝刻本，卷 1，頁 26。

⁵⁵ 清·汪兆鏞著，鄧駿捷、陳業東編校：《汪兆鏞詩詞集》，頁 184。

⁵⁶ 詳可參見陳予歡：〈民初之廣州市政建設〉，《廣州文史》46（1994.8），頁 156。金炳亮：〈孫科與廣州市政建設〉，《嶺南文史》4（1991），頁 30-36。

磚》。

廣州拆城的殘片是汪兆鏞個人記憶與歷史記憶的交會處。其拆壞作為一個隱喻，既是歷史古蹟為新政所銷毀的象徵，亦是個人附著於地景的記憶終將消失殆盡。殘磚作為一種斷片的型態，預告了拼湊回復的不可能性。意即，完整的物件至此已不復存在，僅能從殘磚敗瓦之中，通過外在的文獻與個人的想像重製原物的樣貌。斷片的引誘促使著人的回憶與之碰撞、錯雜與交疊，迸裂出無數時空圖像的對照，勾引出文人「蕪城」、「黃墟」的人事異變之悲。遺民藉由記錄斷片的歷史，連綴個人與歷史的關聯之餘，亦希冀通過歷史的整理與重現，為廣州記錄今昔掌故，以資後世之餘，尚能確認個人在新舊文化交錯中的時代定位。汪兆鏞晚年潛心著作，蒐集文獻、整理典章制度的目的即在此。舊日於學海堂所學所識以及廣州故鄉的種種成為他後半生的支柱。他流離的生命因記錄與書寫廣州相關的史地考古而得到某種情感上的延續與連結，稍稍寬慰了遺民為當世所遺的幽怨情緒。碑銘與文獻連結了遺民文人更為纏綿的歷史時間與記憶。

三、回返：流寓的自我書寫

澳門自明代中葉（1557）以來，即由葡萄牙人向明代承租此地。此後葡人的統領範圍不斷擴大，至 1887 年，中葡訂定「中葡和好通商條約」以後，澳門遂成為葡萄牙人的殖民地。就當時環境來看，民初時港澳並未設置海關，僅需船票即可往來兩地。加上港澳的主要語言皆為粵語，地理位置又與廣州相近。這種特殊的條件讓澳門也如同香港一般，逸出中國政局變亂的中心，成為辛亥變後廣東文人避居的武陵桃源。就汪兆鏞個體而言，他之所以選擇避居澳門，一方面是由於與他相善的友人也多移居澳門，且澳門在明末以來即有不少遺老寓居於此。汪兆鏞以遺老身分至澳亦為順理成章⁵⁷；另一方面，雖然汪兆鏞始終以遺老自持，但他與汪精衛之間的

⁵⁷ 汪兆鏞在〈竹枝詞〉之四十的小注寫到：「明末諸遺老多為澳門之行，墨井、跡刪、不偕、獨漉、

關係仍舊招來了不少民國官員如胡漢民等人上門請求出仕。⁵⁸為避免此類紛擾，避居異地亦成了當時的選項之一。因此，即使澳門與廣州間的距離雖然不如香港與廣州為近，但人際網絡與政治活動都較香港為單純。港澳間既近且遠的距離，既不至於與香港的友朋斷絕互通有無的管道，亦能篩去一些不欲有所交集的人，自然為汪兆鏞隱居避禍的最佳選擇。這種地理的關聯性也讓遺民個體與家族群體的頻繁流動成為可能。

遺民文人流動過程中的自述表現出他們輾轉流離之下內心的痛苦無奈與徬徨難以自安心緒。流寓之際的眼前風景，無一不是過往的召喚與顯像；避居殖民地的抉擇縱使讓這些文人得到了暫時的安憩，然而昔日家園與傳統文化逐漸凋蔽的陰影卻猶如鬼魅，如影隨形地纏繞著他們，成為終生無法遁逃的夢魘。非出於自願的遷徙，讓汪兆鏞晚年不斷奔波勞頓於故鄉與客居之間不得安歇。幾次以為廣州局勢平穩得以回鄉，但不久又遭逢動盪而再度舉家避居。這種去住往來之下，也讓他不免有「蓬累吾遠行，圖作流民看」之嘆。⁵⁹舊園無由長居久安，雖然眼下暫棲於殖民地，卻也僅是由民國的新政權又移轉到另一個異國統治地域之下而已，無法撫慰遺民為世變所衝擊的心靈。反過來說，在異國政權所統治的土地上才能擁有片刻安歇的錯落，毋寧是更大的諷刺。汪兆鏞晚年自述「衰年遭亂，已九至澳，今十次矣」⁶⁰，即表現了此種倉皇難安的心靈狀態。相較於澳門的過渡性與中繼性，負載著汪兆鏞前半生回憶的廣州才是唯一真實的所在。從而汪兆鏞的異地書寫總帶有一種濃厚的原鄉情懷，以連結原鄉書寫的姿態，描繪澳門地景地貌，意圖拉近廣州原鄉與澳門的距離。誠如他在〈澳門寓公詠〉的總序所言：「雖遺跡多湮，而流風可溯。爰考梗概，紀以短章，懷古茫茫，聊誌嚮往。」⁶¹由宏觀來看，從遺跡的考索連結背後的源流

翁山以外，當尚有之。行篋攜書無多，俟再考。」避地至澳門，或亦有其文化上的考量。清·汪兆鏞著，鄧駿捷、陳業東編校：《汪兆鏞詩詞集》，頁 120。

⁵⁸ 汪兆鏞早年在張之洞幕下時即曾因為汪精衛參與革命而招致政治風波，最後為一家大小的生計，不得不與表明與汪精衛斷絕關係。汪兆鏞在民國以後誓不任事，而有「忠君」、「歸隱」等主張，或許某程度也帶有欲與政治隔絕，以保全家族的考量在其中。

⁵⁹ 清·汪兆鏞著，鄧駿捷、陳業東編校：〈鐵盒至澳匝月，復返廣州，賦簡〉，《汪兆鏞詩詞集》，頁 31。

⁶⁰ 清·汪兆鏞著：《清微尚老人兆鏞自訂年譜》，頁 56。

⁶¹ 清·汪兆鏞著，鄧駿捷、陳業東編校：《汪兆鏞詩詞集》，頁 110。

始末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即能將殖民地的遺民敘事納入歷史傳統的大敘事之下，覓得遺民書寫的位置。從微觀而言，亦是藉記錄澳門地物風貌以及曾寓居澳門的先賢事蹟這些短章，延展出另一種遺民敘事的個別風貌。縱然遺跡會隨著時光流逝而湮滅，遺民的存在也只是時間光譜裡微小的線段，沒有延伸的可能，只有凋零與湮滅的憂懼。但在「懷古茫茫」的當下，唯有通過敘述與書寫，才是與時間抗衡的唯一手段。

（一）異域於今成樂土——異地風物的描繪與遺跡的歷史追索

古蹟遺物或是碑銘雋刻的象徵與隱喻往往帶有文化符碼的功能。對過往事蹟的記錄與蒐集，甚至是歌詠、追溯古蹟古事的表現則反映出文人欲藉由事物的結構、象徵進行自我書寫的意欲。汪兆鏞透過對歷史碑傳古蹟的尋索與敘寫，異地景物的描繪，將這些事物重新鑲嵌入歷史情境以連結個人生命敘事的過程，既是遺民主體抒情意識的彰顯，同時也是對廣東，乃至澳門地域歷史的補充與修正。即便遺民內心認定的道統無法回復，書寫異地、尋覓前賢遺跡的行為，除為個人的避居提供合理性的同時，亦是通過地景與歷史的連結，尋索一條精神上的聯繫與歸鄉之道。

粵澳之間不同的風物地景以及歷史背景提供了汪兆鏞寫作的基礎，異地的安適也提供了文人喘息的空間，也撫慰了南來文人流離倉皇的心靈。汪兆鏞在寓居澳門時期留下了不少記錄澳門風物及歷史的詩詞作品，作於 1917 年的〈澳門雜詩〉即是其中代表。序中汪兆鏞陳述他的撰作目的，是為了要續「乾隆間寶山印氏、宣城張氏所撰的《澳門記略》」，現今「續纂閒如，靡資考鏡」。他在辛亥變後避地澳門，「暇日登眺，慨然興懷，拉雜得詩數十首。徵引故實，分注於下，仿宋方孚若《南海百詠》例也。」⁶²記錄了一系列汪兆鏞在澳門出遊所見聞的地景以及相關的歷史因緣。如〈馬蛟石〉、〈西灣〉、〈青洲〉、〈澳官公廨〉、〈大三巴門〉、〈普濟禪院〉等作。詩後小注也多引述《明史》、《澳略》等史志作品，細數這些地景的前世今生與地理特色。⁶³其餘的〈澳門寓公詠〉與〈竹枝詞〉等作品，則是汪兆鏞寓居澳門所見所聞

⁶² 清·汪兆鏞著，鄧駿捷、陳業東編校：《汪兆鏞詩詞集》，頁 99。

⁶³ 汪兆鏞這一類的作品為數頗多，無法一一列舉，在此僅列出較具代表性者。詳可參見清·汪兆鏞著，

的自述。

即便如此，汪兆鏞在這些作品的字裡行間仍舊不時透露出對舊園的懷想與渴望，以及不斷的自我說服異地風光安居。如「此地即桃源，嗟哉思避秦」（〈新荷蘭園〉）、「但得安居便死心」（〈澳門寓公詠之一〉）、「雙灣孤客淒涼甚，未是鴟夷泛五湖」（〈澳門寓公詠之三〉）或是「異域於今成樂土」（〈竹枝詞之三十九〉）等。⁶⁴他一方面試圖說服自己澳門的風光景物明媚，既能避去辛亥後的紛亂，生活亦平穩閒適；然而另一方面，兩地不同的景物風貌和習俗也時時刻刻提醒他身處異地的事實。如〈竹枝詞〉之三十六小注即有：「舊曆中秋日為新曆九月杪矣。是夕，澳人門首多懸綵燈，描畫甚精，與廣州中秋夜高揭竿燈不同。」⁶⁵澳門「海隅叢爾」的邊陲身分，以及「黑奴兮紅鬼」（〈大街〉）、「胡琴蕃衲已尋常」（〈竹枝詞〉之六）⁶⁶等異地風光的見聞，在在顯示此處即使與廣州相距不遠，但節令風俗已有不同。這兩種情緒的交錯矛盾與衝突，讓汪兆鏞對廣州故土的思念更甚。即便他在澳考察了許多自明代以來的「寓澳濠賢」的生平事蹟，也能品味當地土產芥菜、果物荔枝與蠔油的鮮美，但卻始終無法真正地在這塊土地上安身立命。從他五十歲以來往返澳門與廣州的次數，以及居澳的時間來看（見附錄二），最長的一段是在汪兆鏞過世的前兩年，其餘則是數月至一年不等，甚至有避兵澳門不久，即「旋返省」的紀錄。這種短期的寓居、遷徙與流動，正好反映出殖民地中繼站的性質——僅提供轉換或暫時滯留之用，而不是身心安頓的終所。

或許正是由於此種矛盾心態，汪兆鏞在寓澳期間，除了記錄寓澳前賢事蹟之外，他也試圖從追詠記敘古蹟的詩與詩序的框架中，解明南宋、廣東與港澳間的歷史連動；其中最能體現這種敘事意圖者，應為〈永福社行序〉一文：

澳門西偏，土名沙梨頭，有永福古社。石欄峻偉，如殿陛制。其上古木參天，下為淺水灣。石坊題「水月宮」，大學士何吾騶書，年月漫滅，當在明季永

鄧駿捷、陳業東編校：《汪兆鏞詩詞集》，頁 99-120。

⁶⁴ 引詩可參見：清·汪兆鏞著，鄧駿捷、陳業東編校：《汪兆鏞詩詞集》，頁 105、110 及 120。

⁶⁵ 清·汪兆鏞著，鄧駿捷、陳業東編校：《汪兆鏞詩詞集》，頁 119。

⁶⁶ 清·汪兆鏞著，鄧駿捷、陳業東編校：《汪兆鏞詩詞集》，頁 107、113。

曆時，志乘未載。惟淺灣見《宋史·二王紀》，而事蹟未盡詳。覈道光香山縣《祝志·馬南寶傳》：「景炎二年，端宗自潮之淺灣，航海避敵，過邑境。南寶現粟千石餉君，端宗召拜權工部侍郎。帝幸沙涌，暫宮於南寶家。元師陷廣州，募潮居里民出師。帝舟復駐淺灣。元兵來襲，張世傑等與戰於香山島，敗績。奉帝舟退保秀山，旋次碙州。帝崩。」……淺灣即今之淺水灣，無可疑。且厓山有宋端宗永福陵，與此社名相同，當寓名從主人之義，或以行宮遺址復為疑陵。元明異代，名稱不一。鄉人立社，蓋不勝故國禾黍之感。余避兵過此，慨然興懷，為詩記之。

波濤險旅蛟鼉穴。馮夷肆怒駕鵝飛，真靈上動青天泣。景元改年嗟滄桑，陸、張、蘇、劉情激昂。紹興置縣香山寨，獻粟乃有馬侍郎。侍郎家在沙涌畔，烏巖金臺隔澳岸。澳岸盈盈有淺灣，舟師暫駐關叢灌。掃除第宅躬迎鑾，艱難捍衛臣力殫。園林纍纍紅荔熟，猶記御摘登玉盤。紙鳶信斷佗城陷，醜酒誓師犀甲擐。潮居里民應募從，復次灣頭作行殿。一從碙州悲駕崩，義民戀主營疑陵。此地宮址或陵址，圖經零落都無徵。崖山有陵曰永福，茲社鑄題名相複。墜緒茫茫當可尋，遺制巍巍儼在目。吁嗟呼，行宮數十移陵五，井隩荒蕪迷處所。靈風遠接宋王臺，忠魂長傍銅鼓嶼。晚明榜署水月宮，象岡寄恨滄溟中。人間荊駝如夢古今同，宋家忠厚遺澤垂無窮。年年雞豚報賽來村翁。⁶⁷

〈永福社行序〉為汪兆鏞避居澳門時出遊至永福古社所記錄的一段考述文字。作者由古社的建築體制與地理景觀偉岸不凡寫起，談到其中「石欄峻偉，如殿陛制」，既有古木參天，又有淺灣居下，極言此處地物風貌的帝王氣象。接著沿續歷史的時間軸往前代推進，將已歲月經久漫漶的因「水月宮」年代推溯至晚明永曆年間。從現下地景地貌的特定空間描寫轉入歷史時間，由現今、晚明而追溯至南宋，彰顯古社的年代久遠之餘，也牽合了歷史的演變脈絡。接著汪兆鏞更進一步針對「淺灣」、澳門「淺水灣」一處的歷史為論，援引《宋史》與地方志裡面的記載，將淺灣的歷史納入南宋二帝的流亡路線，解為南宋端宗退居碙州（香港大嶼山）駕崩前的駐蹕之處。

⁶⁷ 清·汪兆鏞著，鄧駿捷、陳業東編校：《汪兆鏞詩詞集》，頁40。

詩中的「南寶」，即馬南寶（1250-1285），原籍河南開封，後移居廣東新會。宋景炎 2 年（1277）端宗在潮州淺灣被元兵追逐，航海避敵過香山境，南寶獻糧千石以餉軍，獲端宗敕獎，召拜工部侍郎。後張世傑等人進駐沙湧，以南寶家暫作行宮。祥興元年（1278）春，端宗駕崩。張世傑、陸秀夫派曾淵子充任山陵使，奉端宗遺體還殯於南寶家，把偽作之靈柩出葬，南寶雇人於壽星塘作五處疑塚，後人稱為宋端宗疑陵。⁶⁸詩中的「義民戀主營疑陵」，即是指稱南寶以及鄉里民人為主設遺陵的事蹟。又「靈風遠接宋王臺，忠魂長傍銅鼓嶼」，「忠魂」指南宋劉師勇。劉師勇（生年不詳-1278），南宋時以戰功歷環衛官。常州城陷後，劉師勇從二王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為，憂憤縱酒卒，葬於鼓山。汪兆鏞曾於光緒辛卯（1891）客居赤溪時訪得南宋劉師勇祠墓於銅鼓山，並有〈琵琶仙〉（玉座飄苔）詞，抒發汪兆鏞對劉師勇壯志未酬的孤絕憂憤，以及歿後的飄零慘淡的同情。⁶⁹事隔多年，汪兆鏞關注的焦點則移轉到了劉師勇以身殉國，永伴君側的節操，與馬南寶為帝經營的苦心——為人臣子者為報君恩厚澤，「明知不可為而為」的忠義事蹟。兩篇文章分別作於辛亥革命前後，正好提供了我們對照的線索——由清室覆滅以前的對劉師勇的同情，轉而至亡清後，借劉師勇的書寫論證「宋家忠厚遺澤垂無窮」，婉曲地為自身的遺民選擇辯駁。如將此序與前面提到的忠清思想連結，汪兆鏞記錄永福古社的動機即昭然若揭——當時風雨飄搖的宋室即成為逝去的清代的隱喻。詩中提到的馬南寶或劉師勇等人，無論是捨生殉死或是盡忠守節，都表現出了為人臣子感念朝廷、不事二主的氣節。這樣的論述也隱含了汪兆鏞對殉死與惜生兩種抉擇的評價：無論殉死與否，只要能為前朝守節行義，則應給予相同評價，並無優劣之別。

其次為汪兆鏞對永福古社命名的詮釋。事實上，此處的論證頗為粗疏，僅作一

⁶⁸ 汪兆鏞在「象岡記恨滄溟中」一句下引《廣東名勝記》：「宋亡，馬南寶有詩云：『寸心難與夜潮消』，『眾星耿耿滄溟底。』」極言馬南寶眷懷南宋的忠誠。汪氏另有〈武仲以詩見懷，次韻和答，並約訪南宋馬侍郎南寶故宅〉一詩，即與友相約訪馬南寶故宅，感於其節義所作。見清·汪兆鏞著，鄧駿捷、陳業東編校：《汪兆鏞詩詞集》，頁 61、42。

⁶⁹ 清·汪兆鏞著，鄧駿捷、陳業東編校：《汪兆鏞詩詞集》，頁 124。汪兆鏞對劉師勇的論述頗多，《微尚齋雜文》中亦有〈宋和州防禦使劉公事略〉一文，集結了所有本傳與地理志中有關劉師勇的紀錄，極寫其驍勇善戰與忠義行止。見清·汪兆鏞：《微尚齋雜文》，卷 5，頁 101。

般性印證即將澳門淺水灣認定是史書所載的「淺灣」。他說：「崖山有陵曰永福，茲社鏤題名相複。墜緒茫茫當可尋，遺制巍巍儼在目」。以命名的重覆與遺制仍存兩點牽繫起崖山的「永福」陵與此處的「永福」社的歷史交集；而現下的紀錄行為便是挖掘此種因時間而隱沒的「墜緒」，以及無人著意的「遺制」，並賦予其歷史的定位與意義。鄉人感於黍離麥秀、家國覆亡之悲成為古社建制的由來，凸顯出廣東一地的遺民傳統以及港澳兩處的歷史淵源。從而，詩中提到的「宋王臺」也並非毫無來由，而是欲呼應陳伯陶宋臺集會的歷史敘事。總之，通過對南宋遺跡的追認與紀錄，汪兆鏞以「永福」此一命名的承繼扣緊了港、澳兩處與南宋的歷史前緣。他引經據典論證澳門淺水灣成為南宋帝國覆滅之前，除宋王臺、厓山以外，皇帝的駐蹕處之一，也將澳門的古蹟地景納入南宋流亡歷史的一部分。廣東、澳門與南宋的歷史敘事，南來文人遺民地景的架構至此已告完備。⁷⁰

關於這一類的遺民地景書寫的意義，高嘉謙曾概括《宋臺秋唱》為「表徵了南遷遺民的中原眼界和憂憤，卻同時認知九龍地域作為避地，進而安身立命的所在。追認宋代遺跡，賡續正統，也同時重新命名了英殖民的九龍地域對這批南來文人的深層意涵。」⁷¹將歷史的縱軸結合地景空間，以成就殖民地空間的論述與遺民正統所在。汪兆鏞的敘事架構與追認意識不如《宋臺秋唱》般完整而宏大，但同樣有著以地景歷史的寫作成就自我敘事的意欲。他由現實空間、歷史時間以至於地方命名三個方面簡單地構築出了永福古社的歷史樣貌，並且藉由類似的歷史身世與相同的地理命名聯繫港澳兩處與南宋二帝流亡歷史，從歷史的文脈、地理的線索，乃至於命名的承繼，讓歷史記事、個人經驗經由地景敘述借屍還魂。南宋二帝南遷的文化象徵是為避居殖民地合理性的背書當然無庸置疑，但汪兆鏞更想凸顯的是南宋朝廷風雨飄搖，行將危殆之時，廣東一地的士人仍舊為延續王朝正統而努力；在亡宋以後，這批遺民仍舊戀慕故主的恩澤，為其殉身或守節的大義。換言之，汪兆鏞在建立南宋流亡敘事的同時，也順道將自身鑲嵌於「忠義戀主」的脈絡之中，表明個人對廣東忠義 / 遺民傳統的承繼。如與陳伯陶一系列追認九龍宋王臺歷史的作為對

⁷⁰ 高嘉謙：〈刻在石上的遺民史：《宋臺秋唱》與香港遺民地景〉，頁 298-304。

⁷¹ 高嘉謙：〈刻在石上的遺民史：《宋臺秋唱》與香港遺民地景〉，頁 297。

照，汪兆鏞對永福古社的記述，恰好是對陳伯陶所發起的宋王臺遺址的追認進行了補充與完備，填補了南宋二帝南遷至香港九龍之前的流亡路線。歷史的追認讓港澳成為延續南宋正統的雙城，將港澳現存的南宋遺跡鋪展成遺民的抒情地景，延伸了南宋／清末的時間線段以及廣東／中國的地理位置成為相互對應的概念，助長了文人居處其間的認同感。廣東歷史的地位隨著南遷路線而得到提升。澳門淺灣於是成為另一個寄寓遺民情懷與歷史想像的遺址，在尋訪、記錄並牽合南宋歷史的同時，亦隱含著對舊秩序的回返意欲。

綜上所述，汪兆鏞縱然書寫澳門，然而他所見的一切景物，無不是廣州的對照。即使他在詩詞中展現出欲說服自己澳門為安居之所的意圖，卻終究無法在異鄉真正安身立命，才有不斷往返粵澳的情事。其次，汪兆鏞對澳門的地景空間敘事並不完整，史料細節論證也頗為粗疏。但他通過個人記憶與廣州、澳門的歷史記憶的結合，成就了獨具個人抒情性的遺民敘事脈絡。這一類的記憶的書寫反映出民初的避居殖民地的廣東遺民的幽微心緒——隨著時間的流逝益發明瞭回返昔時的渺茫，個人所信仰的價值也隨著時間的侵蝕而轉成了困惑、徬徨與自我懷疑。唯一的真實，即是不斷地書寫遺跡古事與自身，藉此貼近那已然逝去的曾經。

（二）我亦江潭憔悴客——詩詞世界中的自我抒情

遺民文人另一項「懷舊」的特徵，即表現在舊體詩詞的創作。傳統的文體論著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強調的是「情與體合」，文人所抒之情與言詞表現必須能與所擇選的文體相互配合，以達成更為精緻的藝術表現。這批民初的遺民文人使用舊體詩詞創作，不單僅是選定抒情的框架與體式，亦隱含著文人政治取向的判斷與靠攏。於是，古體詩詞遂成為遺民文人藉之以新體文學，如白話文或新體詩等創作型態分庭抗禮的抒情脈絡。對此，吳盛青的說解頗能切中肯綮。她說：「當社會秩序變得不穩定的時候，詩歌固定的形式即成為一些文人所能把握的少數實在的東西，它為這些文人提供了一個『微型的世界』（miniature model of the world），讓他們可

以在其中抒發情感，以此來維護他們心目中一致的世界觀和協調的文化秩序。」⁷²民初亂事頻仍的不穩定的政治狀態讓遺民文人更加嚮往昔時穩定的世界。而古體詩詞特有的結構、節奏以及字詞組合，除與文人自身生命脈絡貼近外，其既定的創作形式尚能寄存了個人的記憶與想像，連帶給予了文人穩定感與安心感。在詩詞的世界裡，隔離外界不解的眼光之餘，也製造了一個能讓自己盡情沈溺與緬懷於傳統文化秩序與前朝往事的抽象空間。遺民文人認同古體詩詞框架下所蘊含的價值預設，藉由創作將自我重新置身於傳統之下，招喚同情共感。這一類緬懷故國的作品多是透過重遊故地所激盪出的今昔之思。也由於此類作品或抒發個人懷抱，或因唱和對象多為故交好友，其中的情感言說亦更加直切。不僅只是抒寫個人感於世事變遷，茫茫不知所終之悲，去國懷鄉，往日難返的抑鬱也不時可見。汪兆鏞寄予龍榆生（1902-1966）的詩詞正為顯例。引詞如下：

廣州北城跨山，山多紅綿，暮春花時，照耀雉堞間，偉麗絕勝。聞山中人云：「二十年來林壑修貿，非復承平日風景。」余亦積疴偃蹇，鍵戶罕出，倚竹奮響，為之憮然。

霸氣銷沈山嶸嶸。望極愁春，春釀花如血。照海燒空誇獨絕，東風笑客誰堪折？一片蕪城都飽閱。火樹年年，搖落清明節。聽取鷓鴣啼木末，畫情空憶山樵說。〈蝶戀花·粵秀山木棉和榆生〉⁷³

龍榆生師從朱祖謀，朱氏臨終前曾以校詞雙硯授之，以示傳承之意。龍曾請汪為其〈減字木蘭花題龍榆生受硯廬圖〉題詞，又《近三百年名家詞選》亦收有汪兆鏞詞三首，可見兩人交誼與龍氏對汪的推重。⁷⁴粵秀山位於廣州北側，為學海堂舊址。阮元於 1820 年創建當時便以越秀山為百年山麓「喬木繁翳，木棉參天」，決定落址於此。本闋詞雖表面寫暮春清明見粵秀山木棉，實際抒發的卻是滄海桑田的異變之感。上片極寫粵秀山之高峻與木綿紅豔勝血的勝絕景象。下片轉入今昔之感的描寫。眼前的舊景的荒蕪敗落，木棉至暮春不免搖落，縱使年年花雖相似，人已與時俱老。

⁷² Shengqing Wu, *Modern Archaics: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the Chinese Lyric Tradition, 1900-1937* (Cambridg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 2014), p. 22.

⁷³ 清·汪兆鏞著，鄧駿捷、陳業東編校：《汪兆鏞詩詞集》，頁 145。

⁷⁴ 清·汪兆鏞著，鄧駿捷、陳業東編校：《汪兆鏞詩詞集》，頁 144-145。

鷓鴣哀鳴，憑添心傷。詞序藉山樵之口轉述「二十年來林壑陟貿，非復承平日風景」，往日風景如今已無緣得見。「林壑陟貿」既指現實的今昔異變，也是政體轉換的隱喻，昔日的承平與今日的動盪不安兩相比較，未免致生今不如昔的惆悵。「空憶」，是言語的述說終究淪為口傳耳聞。而往日漸遠，遺民飽受著時間的消磨，過往承平猶如一夢，僅能在逐漸斑駁的回憶裡面拼湊往日陳跡，試圖留下些什麼。對照遺民文人自身的處境，人將老去，而世事已矣，自然不免有「憮然」之嘆。

類似的例子亦可見於汪兆鏞與吳道鎔在澳門時期的重陽唱和詩。

索居容易又重陽，海角登臨話故鄉。雜樹暗疑三里霧，亂流曲寫九迴腸。烽煙遠道無消息，風雨歸帆尚渺茫。何似當年陶令宅，荒籬猶有菊花黃。〈乙丑重九日，偕吳澹盦、梁小山、金滋軒、馬交石登高，下至陶園小憩〉

世難為歡苦不常，盲風恠雨又重陽。勞身坐聽萍蓬轉，破帽終羞鬢髮蒼。遠岫歸雲看縹緲，故園叢菊歎荒涼。殊方猶是承平象，勉為多情盡一觴。〈和作 吳道鎔澹盦〉⁷⁵

廣東習俗以清明、重陽為春秋兩祭，為家族團聚、上山祭拜先人的重要節日。番禺一地傳統亦以重陽登高能趨吉避邪之說。這一組記遊詩是乙丑（1925）重陽時，汪兆鏞與吳道鎔（1853-1935）等人於澳門出遊所作。吳道鎔，字玉臣，號澹庵，廣東番禺人。光緒6年與同鄉梁鼎芬同科進士，入翰林院，中年辭官返粵不復出仕，自此「被服儒素，講學終其身」，專力編輯鄉邦文獻歷二十年。汪兆鏞原詩開頭即點出自身離鄉索居已久，又遇重陽節序登高而有懷鄉之嘆。「雜樹」以下兩句，既寫登高路途的迷亂曲折，亦是回返舊時之路的遼遠迷茫。風雨歸帆，表現人處於大化浪潮之間，歸去無方，又不知何以為繼的茫然若失。透露出汪兆鏞不知歸鄉何處，擺盪躊躇的心境。詩序的「陶園」為澳門酒家樓之名，是在文人明白歸鄉無望之際，尚有陶園菊花可供安慰。吳道鎔的和作同樣寫思歸懷往的情懷。世事紛然雜亂，悲多歡少；重陽風雨而人身如轉蓬，行行重重，而人僅能被動地任憑時間的摧折流逝而老去。歸雲飄渺與叢菊荒涼，亦是呼應了汪兆鏞原詩中風雨歸帆的隱喻，指涉舊園

⁷⁵ 清·汪兆鏞著，鄧駿捷、陳業東編校：《汪兆鏞詩詞集》，頁35。

的回返無由，僅能把握眼下暫時的安樂，與友人同醉一觴。同樣為避地之作的〈減字木蘭花〉與〈蝶戀花〉，亦透露出了遺民的深沈哀感。請見引詞如下：

蜃霧漫空吹不定。浮海年年，身世同飄梗。有客談瀛多異境，藜床病眼誰堪省。歸夢迢遙思越井。滿地風煙，漠漠迷三徑。經卷藥鑪銷晝永，未妨腰瘦成孤另。〈蝶戀花·丁卯十二月澳門病中作〉

丁丑七月辟地澳門，偕滄萍過普濟禪院，觀愁山、天然、澹歸、跡刪、石濂諸名僧遺墨，藏弇閱三百年矣。

人間何世，為灑前朝遺老淚。冷蕨荒山，殘墨淒涼那忍看。怒潮嗚咽，不管行人歌與泣。禮罷空王，閒戀鐘聲話夕陽。〈減字木蘭花〉⁷⁶

首闕是汪兆鏞於丁卯年（1927）所作。身世飄零，浮海漂泊，詞中感嘆前路茫茫未明，客在他鄉，連夢裡的歸路都顯得遼遠茫漠。唯一認知到的，只有現下因病而消瘦的自己。次闕為明末遺老的墨跡在三百年後為同樣避地汪兆鏞得見，難免產生情感的自我投射。「遺老」、「冷蕨」、「荒山」、「淒涼」與「夕陽」等詞彙，透露出遺民為世所遺，生命的最終歸依便是荒冷的邊陲一隅的感嘆。

遺民文人避居他地是為獲得住居的暫時安穩，以古體詩詞進行情感抒發，則是想透過熟習的體式獲致安心感。由於詩詞文體相異，所舒展之情意內涵亦有所不同。在汪兆鏞的詩篇中，既有與友人相互唱和，慰撫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境遇，盡力在有限的時空之中尋覓振起的力量；也有個人避居異地，重新面對自我生命的流離的反省。然而，這樣的心境，是否再重返故土以後即能得到寬解？另一闕〈少年游并序〉，或許提供了我們這個問題的解答。引詞如下：

廣州承平時，鐙事甚盛，內城亞婆塘大珠鐙，正南街蓮花鐙、天平街大樹鐙，其最著也。亂後物力凋敝，一切罷去。庚申元夕，裊裊巷陌間，慨然興懷，倚小令紀之。

金荷銀樹繡珠香，鐙事記閒坊。一樣東風，鶯慊燕戶，都戀春光。十年

⁷⁶ 清·汪兆鏞著，鄧駿捷、陳業東編校：《汪兆鏞詩詞集》，頁139、145-146。

今夕叢祠路，暮雨暗桃榔。隔籬有客，白頭相對，共話滄桑。⁷⁷

廣州元宵燈會歷史可追溯自南漢時期，為當地一大盛事。汪兆鏞歷經朝代變更，承平變貌。當他眼見物力凋蔽不復昔時，其間所感受的盛衰今昔之感，自然更為深刻沈痛。並且，不僅是眼前的景象勾動回憶，香氣由濃轉淡所蕩漾出的情感跌宕也加深了這份淒楚。乍然相對，唯有無盡的滄桑淒惶。另一闋〈天香〉的詞序亦有：「友人仿佛香閣製香餅，云是內監李承恩所傳也。眇懷淒感，不能無詞，依唐藝孫韻。」⁷⁸《樂府補題》為宋末元初遺民相互唱和，互抒黍黎之悲與亡國之痛的詠物總集，其中收有〈天香〉一調。汪兆鏞在此借〈天香〉詞牌寫昔時內監所傳香餅一事，亦有寄意言外的意蘊在其中。序中寫到香餅製法彷彿如舊，惟朝代更迭，原本的「天香」已成「舊時王謝堂前燕」，現今飛入尋常百姓家。寥落的、變動的，難以掌握的更迭都到眼前，相較於詩中的今昔之感，仍存眷懷家國的文人姿態；汪兆鏞在詞中所流露的寥落無依，或許才是流離變動的時代洪流中，遺民最為誠實的自我告白。

與當時梁鼎芬等遺民不同，汪兆鏞從未正式進入官僚體系。既無如陳伯陶、王國維等人親炙君恩，直入南書房；亦非梁鼎芬、張其淦等人，進士及第，官至高位，而是專以遊幕為謀生，僅僅屬於當時邊緣的下層文人，幾乎沒有任何得以撼動輿論的政治權力。再加上他與汪精衛的關係，讓他無論在清末或是民初都夾雜在兩難處境。或由於如此，汪兆鏞的詩文絕大多數都是表明個人對前朝的忠貞，而絕少觸及恢復國體等政治言說。然而在大時代變動下，即使是微小的文人也能感受到時代震盪的威力。對他而言，政體變革最令他痛苦難耐的，是熟悉事物的一一滅失、往日承平的難再以及舊時古蹟規範的毀壞。「亂後物力凋敝，一切罷去」，所有的記憶中的、生活中的慣常事項都因為亂事而停擺凋敝。徘徊於舊時巷陌，熟悉的過往卻重尋無處。「十年今夕叢祠路，暮雨暗桃榔。隔籬有客，白頭相對，共話滄桑」，與故人異時相對重見，也僅剩無限感嘆。遺民文人無論是在異地，或是重遊故里，他們眼前所見的風景無一不是悲哀所凝鑄而成者。廣州作為他們念茲在茲，亟欲歸返的故土。在詩中，無論是「荒籬猶有菊花黃」或是「勉為多情盡一觴」，其中所體現的

⁷⁷ 清·汪兆鏞著，鄧駿捷、陳業東編校：《汪兆鏞詩詞集》，頁137。

⁷⁸ 清·汪兆鏞著，鄧駿捷、陳業東編校：《汪兆鏞詩詞集》，頁139。

文人形象，是即便歸鄉無望，仍試圖在現下覓得安棲之所；相對於此，文人在詞中表現的形象則多為一往情深、去而不返的抑鬱，空無而重尋不見的落寞。汪兆鏞在澳門異地思念廣州故土，但即便得以重遊，這塊「故土」仍舊不免感嘆今昔的變異。換言之，他所欲回返的廣州，只是虛幻的回憶影像，根本不存在此一時空。他們在異地凝望著故鄉，是對同一時間下不同空間的懷想；但到了真正回返、重遊舊地之時，他們所渴切的又變成了同一空間下的不同時間線段。如此的反覆矛盾，注定遺民生命的停滯與糾結。詩詞作為哀詠興嘆的體類，既能言志，亦能存史，在清末民初當時，不啻更適宜書寫遺民心境。遺民的生命因興廢變革而偏離預定的原軌，在變革過後的日子裡，「舊時 / 舊制度的復歸」、「懷鄉 / 國」成為他們終生的課題。古體詩詞即正提供了他們另一個熟習的場域，讓他們在現實歸鄉無望之際，尚能藉此獲取另一種形式的「回返」。

四、結語

雖然廣東位居帝國邊陲，正式納入清帝國版圖與學術傳播的速度遠遲於中原江南地區。但也正因如此，19世紀的廣東成為了清帝國最早的通商口岸所在，獲得了較中國各地更早接觸外來的學術新知的契機。相反地，廣東文人對於傳統文化的固守與堅持亦較其他處為鮮明。由於廣東和港澳有著地理上的連帶，辛亥以後，一批文人避居港澳，將之視為中繼點而開展出一系列殖民地的遺民論述。汪兆鏞身為其中的一員，雖言避居，但卻未曾真正在殖民地安身立命。澳門與廣州兩地的奔波往返之間，我們看到的是遺民們對過往的眷戀與亟欲回返的悲願，呈現了時人的流離景況以及徘徊於新舊文化的交界間所面對的時代艱難。

廣東遺民文人的組成與學海堂關係密切。學海堂的學術傳統成凝聚並助長了廣東鄉邦文化與歷史脈絡的考察與認同。學海堂也提供了文人結社雅集的場域，同學彼此間交往的緊密程度則成為日後價值觀的聯繫，成為這群廣東遺民集體意識的底

蘊。

遺民居處於殖民地期間，往往需要憑藉外力確立自己流離生命的軌跡。典範的尋索即是其中一途。與汪兆鏞同屬於廣東遺民的屈大均，由於其生命歷程與汪兆鏞類似，故在詩文中常被引為同調。惟汪兆鏞縱以屈大均的忠君形象為典範，卻避而不談屈大均力倡的華夷之別。這種有意的省略即表現為遺民錄中對倫紀綱常的普遍性與必要性的重申。他駁斥當時盛行的種族之說，極力稱許元遺民雖處於「由夷入夏」之朝代變更，仍舊不改志節，忠貞自持，且不事新朝的表現。那些遺民事蹟的記述，無疑也是想證明即便滄海桑田、物事盡變，忠義流風卻不會因為物換星移、滄海桑田而有所改變。以易變的物事對照精神的恆久存續，亦是汪兆鏞擇善固執、歷時不悔的自我告白。

汪兆鏞由辛亥以後開始一系列的學術著作與刊刻蒐集，其中以陳澧遺稿為大宗。陳澧為學海堂學術全盛時期的象徵，對師長的舊稿蒐集與整理，即是汪兆鏞自身對舊有的學術文化的眷懷與致敬的表現。並且，他從著作與古籍蒐集刊刻兩種方式描繪了自己在辛亥以後的生命圖樣，而從他的言論中亦能清楚看到，他所關注的從來只是倫常綱紀背後所代表的舊文化價值，以及陳澧背後所附隨的那一套學術文化，而無關於政治復辟等問題。對傳統典章文化的眷戀與道德文化的堅持既是汪兆鏞這一類遺民文人的主要形象，亦是他們當時得以自立的依憑。

這一批廣東遺民流寓他處，由他們描述殖民地風景的言語之中，不時能看到他們對個人流落異地的自我設問與亟欲回復往日承平時日想望。汪兆鏞居澳時期，既記錄澳門古蹟風物的書寫，試圖為個人的寓居提出合理性；他也深刻意識到澳門終究是異鄉，而非長居久安之所。從而才會產生日後如此頻繁的流動與遷徙。除此之外，他也通過澳門古蹟的考索，企圖連結南宋二帝的流亡路線。既牽繫起南宋與港澳兩地的歷史連結，亦順帶將個人鑲嵌於忠義戀主的脈絡之下，表明自身對傳統道德的承繼與堅守。並且，古體詩詞既定的創作形式也提供了遺民賴以依存的世界。在文人們身處異地試圖連結中原與標榜自身的同時，往日難返的體認遂成為更加遙遠而難以觸及的距離。港澳的殖民地對這群廣東遺民文人而言或許是避禍的佳處，但這樣的轉進，卻也成為了另一種流放與漂泊。對遺民而言，毋寧只有歸於塵土，

讓滯留於前朝的時間在死亡時終結，才是他們真正解脫的到來。

當那些以為遙遠的、波瀾動盪的歷史事件被個人的生命如實地紀錄且闡述之後，更凸顯了生命的艱難與選擇。從原本「尚或望珠還」至「人間竟何世，淒獨掩柴關」（〈辛亥十月，香港寓樓作〉）的心態變化⁷⁹，更呈現了遺民由期待至失望，而後自我懷疑的心境轉變。汪兆鏞作為民初時期廣東遺民的典型之一，由他在澳門與廣州間多次往返以及對傳統學術事業的堅持與維護，我們看到一個傳統文人在面對中國／西方以及傳統／新式等價值衝突以及勢力此消彼長的氛圍下的心靈。對古蹟歷史的追認與書寫體現了文人遺民欲將自己重新置入歷史文化脈絡下的曲衷與努力。隨著時間的逐漸流逝，遺民在生命的不斷對望與凝視之中，即便明瞭「回歸」之途更加遼遠而艱難，且不免遭受外在眾人之譏，我們仍舊看到了某種遺民樣態：面對生命的流離和回返之間，嘗試定位自我價值的堅持。

⁷⁹ 清·汪兆鏞著，鄧駿捷、陳業東編校：《汪兆鏞詩詞集》，頁 28。

附錄一：汪兆鏞編著文獻編年簡表

年代	書名
宣統3年（1911）	吳石華《桐花閣詞》 先世碑誌、傳狀《誦芬錄》
壬子（1912）	《微尚齋詩》 《雨屋深鐙詞》刊成
甲寅（1914）	《嶺南畫徵略》初稿 陳澧《憶江南館詞》附集外詞、〈校字記〉
戊午（1918）	《澳門雜詩》
癸亥（1923）	《元廣東遺民錄》（1918成書，1923刊刻） ⁸⁰ 《廣州新出土隋碑三種考》刊成
甲子（1924）	《學海堂課藝》
乙丑（1925）	陳澧《公孫龍子注》
丙寅（1926）	《櫻窗雜記》
戊辰（1928）	《雨屋深鐙詞續稿》印行 《嶺南畫徵略》十二卷付印
庚午（1930）	《山陰汪氏譜》寫定 陳澧《讀詩日錄》
辛未（1931）	鈔黃東發、陳澧錄，彙編為《老子道德經撮要》 《番禺縣續志》四十四卷刊成 輯刻《東塾先生遺詩》
壬申（1932）	《廣州城殘磚》
癸酉（1933）	《續貢舉年表》
乙亥（1935）	重刻東塾先生摹《泰山碑》殘字
丙子（1936）	《青湖文集補編》
戊寅（1938）	輯《碑傳集三編》、《敘目》一卷成

⁸⁰ 現存之《元廣東遺民錄》為民國壬戌（1922）年刊本，但自訂年譜編年於癸亥（1923）。之所以如此，除去汪兆鏞個人因素外，或許是由於製版刊刻與成書時期的落差。

附錄二：汪兆鏞來往廣州-澳門年譜(整理自《微尚老人自訂年譜》)

1911年11月	至澳門寓小三巴寺街。
1912年9月	返廣州，辭樂桂埠席，閉門不出。精衛至廣州，回家相見，余誓不任事。
1913年7月	廣州亂，再避地澳門，寓下環街。
9月	返省。
1916年2月	滇桂軍交戰，余又攜家至澳門，寓荷蘭園旁。
9月	廣州平定，挈家返舍。
1917年	朱慶瀾與陳炳琨(案：即陳炯明)不睦，孫中山來粵，亂狀復起。7月12日挈媳孫避至澳門蕉園圍1號。
1918年7月	省氛漸息，挈家返省。
1920年8月	陳炯明回粵，避兵至澳門，寓鏡湖馬路，旋返省。
1922年5月	陳炯明請孫下野，避兵至澳門。12月返省。
1923年10月	陳炯明軍將從增番交界攻入廣州，遂攜兒女赴澳，寓峨嵋街。
1924年10月	返廣州。
1925年正月	赴澳門。
3月	返廣州。閏四月，聞滇粵軍將交關，亟理行裝赴澳，賃居風順堂街劉吉六光廉宅。
1927年11月	廣州大火，木排頭東塾先生故宅藏書版片盡燬矣。余先一日到澳門，寓新馬路樓上，聞之仆跌梯間，傷腰劇痛。
1928年3月	返廣州。
1931年4月	避客至澳門，旋返省。
1937年7月	日本飛機犯粵，避地澳門南灣七號二樓。
1939年7月	歿於澳門，1945年歸葬廣州。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 清·吳道鎔：《澹齋文存》，1942年線裝刻本。
- 清·汪兆鏞：《元廣東遺民錄》，壬戌年刊本，1923。
- *清·汪兆鏞：《清微尚老人兆鏞自訂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
- *清·汪兆鏞：《微尚齋雜文》，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
- *清·汪兆鏞著，鄧駿捷、陳業東編校：《汪兆鏞詩詞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
- 清·屈大均：《翁山文外》，收入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第3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 清·屈大均：《翁山文鈔》，收入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第3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 清·屈大均：《翁山詩外》，收入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第1-2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 清·夏敬觀：《忍古樓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
- 清·陳垣著，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北京：三聯書店，2010。
- *清·陳澧著，黃國聲主編：《陳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清·陳澧評，汪兆鏞過錄，宋·周密輯，清·厲鶚、查為仁箋：《絕妙好詞箋》，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圖書館藏同治11年會稽章氏重刊本，1872。

二、近人論著

- 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 *李有成、張錦忠主編：《離散與家國想像：文學與文化研究集稿》，臺北：允晨文化，2010。
-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清遺民與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的轉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 金炳亮：〈孫科與廣州市政建設〉，《嶺南文史》4（1991），頁30-36。
- 胡平生：《民國初期的復辟派》，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
- 高嘉謙：〈刻在石上的遺民史：《宋臺秋唱》與香港遺民地景〉，《臺大中文學報》41（2013.6），頁277-279+281-316。
- 陳予歡：〈民初之廣州市政建設〉，《廣州文史》46（1994.8），頁156-163。
- 陳永正：《屈大均詩詞編年箋校》，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
- * 彭海鈴：《汪兆鏞與近代粵澳文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
- 斯安竹：《海外藏族的文化變遷與適應——以達蘭薩拉的藏族為例》，臺北：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 *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三聯書店，2006。
- 趙所生、薛正興主編：《中國歷代書院志》，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
- *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 廣州市市政廳編：《廣州市沿革史略》，香港：崇文書店，1972。
- 龍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詞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 羅惠縉：《民初「文化遺民」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
- 〔美〕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
- 〔美〕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撰，車行健譯：〈學海堂與今文經學在廣東的興起〉，《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006.3），頁13-20。
- Benjamin A. Elman, “Qing Dynasty ‘Schools’ of Scholarship”, *Ch'ing-shih wen-t'i*, vol.4, No.6, pp.1-44.
- Elizabeth Sinn, *Pacific Crossing: California gold, Chinese Mig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 John K. Fairbank,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2,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Shengqing Wu, *Modern Archaics: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the Chinese Lyric Tradition, 1900-1937*, Cambridg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

2014.

Steven B. Miles, "Rewriting the southern Han (917-971): The Production of Local Cul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Guangzho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2.1(Jun. 2002), pp.39-75.

Steven B. Miles, *The Sea of Learning: Mobility and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Guangzhou*,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William Saffran,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y: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Diaspora* 1 (1991), pp. 83-84.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Qing] Chen Li, *Chen li ji* [The collection of Chen Li], ed. by Huang Guo-Sheng,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2008).
- Cheng Mei-Bao, *Di Yu Wen Hua Yu Guo Jia Ren Tong: Wan Qing Yi Lai Guang Dong Wen Hua Guan De Xing Cheng* [Regional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 formation of Guangdong Culture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 Li You-Cheng & Zhang Jin-Zhong, *Li San Yu Jia Guo Xiang Xiang: Wen Xue Yu Wen Hua Yan Jiu Ji Gao* [Diaspora and the imagined homeland: a collections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research], (Taipei: Asian Culture Company, 2010).
- Lin Zhi-Hong, *Min Guo Nai Di Guo Ye: Qing Yi Min Yu Jin Dai Zhong Guo Zheng Zhi Wen Hua De Zhuan Bian* [Qing loyalis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2009).
- Lo Hui-Jin, *Min Chu Wen Hua Yi Min Yan Jiu* [A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loyalist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China],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11).
- Peng Hai-Ling, *Wang Zhao-Yong Yu Jin Dai Yue Ao Wen Hua* [Wang Zhao-Yong and modern culture of Guangdong and Macau],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ress, 2004).
- [Qing] Wang Zhao-Yong, *Qing Wei Shang Lao Ren Zi Ding Nian Pu* [Chronology of Wang Zhao-Yong], (Taipei: The Commerical Press, 1980).
- [Qing] Wang Zhao-Yong, *Wei Shang Zhai Za Wen* [The article collection of Wang Zhao-Yong], (Taipei: Wenhai Publishing, 1981).
- [Qing] Wang Zhao-Yong, *Wang Zhao-Yong Shi Ci Ji* [The poetry collection of Wang Zhao-Yong], redacted by Deng Jun-Jie & Chen Ye-Dong,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ress, 2012).
- Zhao Yuan, *Ming Qing Zhi Ji Shi Dai Fu Yan Jiu* [A research on the literati between Ming and Qing dynast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